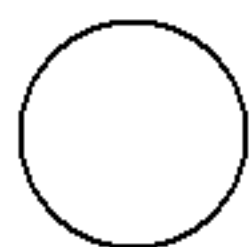


# 红旗

HONGQI



2-3

一九六四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二、三期合刊 ★

## 目 录

### 毛澤东主席对《人民日报》記者发表談話

####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馬人民的爱国

正义斗争.....( 2 )

### 毛澤东主席就最近日本反美大示威发表談話

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偉大的爱国斗争..... ( 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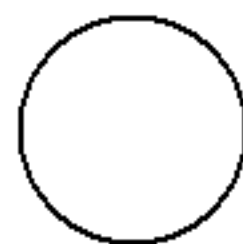
###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 6 )

历史的回顾 ..... ( 7 )

經驗和教訓 ..... ( 10 )

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 ( 13 )



---

駁所謂“反苏” .....	( 17 )
駁所謂“爭夺領導权” .....	( 19 )
駁所謂“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紀律” .....	( 22 )
駁所謂“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 .....	( 24 )
目前的公开論战 .....	( 27 )
維護和加強团結的道路 .....	( 3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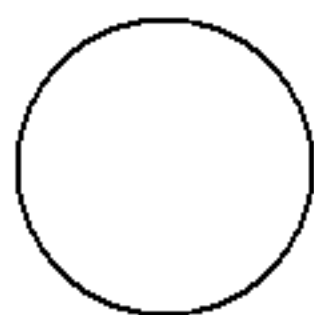
### 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重讀《論共产党員的修养》 .....	赵 汉 ( 33 )
論我国农业的集約經營問題 .....	赵天福 ( 46 )
提倡現代剧 .....	何 明 ( 58 )
現代剧与艺术趣味 .....	王朝聞 ( 61 )
把美国侵略者从巴拿馬赶出去 .....	沙 丁 ( 65 )
战后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貨币斗争 .....	項 冲 ( 71 )

☆ 二 月 四 日 出 版 ☆

---





# 毛澤东主席

## 对《人民日报》記者发表談話

###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馬人民的 爱国正义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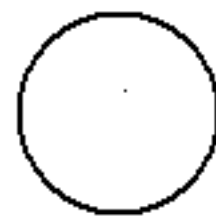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澤东同志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就巴拿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对《人民日报》記者发表談話如下：

目前巴拿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偉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們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鮮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



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舰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 毛澤东主席

## 就最近日本反美大示威发表談話

### 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

### 偉大的爱国斗争

毛澤东主席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晚接見正在我国訪問的日本亞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貿易促进会理事长鈴木一雄，日本亞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园寺公一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赤旗报》駐京記者高野好久。

接見时，毛澤东主席就最近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发表談話如下：

“日本人民在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偉大的爱国运动。我謹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規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潛艇进駐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軍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領土冲绳，要求廢除日美‘安全条約’



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

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这些年来，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这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地方滚出去！”

谈话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接见时在座的有康生、廖承志和吴冷西。





#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从来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威胁。在国际范围内，在一些党的内部，都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

中国共产党一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维护 and 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苏共领导自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以后，一直表白他们也是致力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近期间，他们特别起劲地叫喊“团结”。这使人想起了九十年前恩格斯说过的话。恩格斯说，“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喊团结”。（《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三页。）

苏共领导在标榜“团结”的同时，企图把“分裂主义”的帽子戴在中国共产党头上。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在这以后，苏联



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一直谴责中国共产党人是“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究竟是誰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誰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誰踐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誰粗暴地違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呢？一句话，究竟誰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分裂主义者呢？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够找到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才能够克服分裂的危险。

## 历史的回顾

为了弄清楚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主义的性质和正确地进行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不妨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貫穿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貫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在长期的斗争中，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理論上闡明了无产阶级团结的真諦，并且以他們的实际行动树立了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光辉范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創立了最初的国际工人組織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这个同盟所写的綱領《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并且系統地、透彻地闡明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說，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基础。

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国际无产阶级在这个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了联合各国工人运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創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在第一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同巴枯宁派、普魯东派、布朗基派、拉薩尔派以及其他派别，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其中，同分裂主义者巴枯宁派的斗争特别激烈。

巴枯宁派从一开始就攻击馬克思的学說，指責馬克思想“使自己特殊的綱領、自己个人的学說在国际中占統治地位”。实际上，正是他們企图强迫国际接受他們的宗派信条，以巴枯宁的机会主义綱領代替国际的綱領。他們施展一系列阴谋，不擇手段地拼湊自己的“多数”，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对于巴枯宁派分裂第一国际的公开挑战，采取了原则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一八七二年，在馬克思亲自参加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恩格斯曾經說过，如果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采取无原则的調和态度，那就必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严重的后果。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



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四页。）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反对了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宣布结束以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这些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希望它们能够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工人政党给以特别的注意和关怀。他们曾经多次尖锐地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谋求所谓“团结”而同机会主义妥协的腐败风气。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原则，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哥达纲领》。马克思指出，合并是“用太高的代价换来的”，“这个纲领完全要不得，它会使党遭到瓦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恩格斯指出，这是“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派的投降”。他说：“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十二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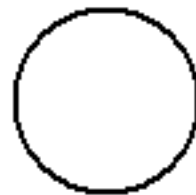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的著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活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糟蹋党和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四十三、三百六十三、三百六十二页。）

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二国际成立了。第二国际处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变成合法主义，使得机会主义在各国党内泛滥起来。

因此，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分成了两大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

恩格斯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特别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恩格斯说，对于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



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百八十二頁。）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些“跳蚤”們就出来公开地、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义，并且逐渐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

偉大的列宁，在恩格斯之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卓越的革命家，肩負起捍卫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担。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們叫喊馬克思主义已經“不完备”和“过时了”的时候，列宁庄严地宣告：“我們完全站在馬克思理論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理論，才能把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列宁：《我們的綱領》，《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頁。）

列宁首先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奋斗。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內部的各种反馬克思主义的派別，进行了不調和的斗争。

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內，正如第二国际其他党一样，存在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革命派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維克，机会主义派就是孟什維克。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維克，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純洁和統一，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維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在一九一二年把坚持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孟什維克清除出党。

所有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派別，都用最恶毒的語言咒罵列宁。他們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分裂主义的罪名加到列宁头上。当时，托洛茨基糾合所有反对列宁的派別，打着“非派別性”的旗号，放肆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党，咒罵列宁是“篡夺者”和“分裂者”。列宁回答說：标榜“非派別性”的托洛茨基，恰恰是“最坏的派別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恰恰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列宁：《論高喊統一而实則破坏統一的行为》，《“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二十六、一百五十四頁。）

列宁明确地表示：“統一，这是偉大的事业和偉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义者的統一，而不是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馬克思主义的人的統一。”（列宁：《統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百二十六頁。）

列宁反对孟什維克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为孟什維主义，就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形式和变种，并且受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領袖們的支持。

列宁在反对孟什維克的同时，也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并且出席了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會議和哥本哈根會議，同他們进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他们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驱使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造成国际无产阶级最严重的分裂。正像卢森堡所说：修正主义者把“从前的自豪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在战场上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集》第二卷，一九五一年柏林版，第五百三十四页。）

那时，在第二国际中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党，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这个党，首先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成为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祸首。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列宁挺身而出，为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而坚决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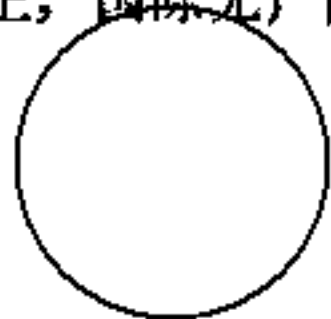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发表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宣布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且严厉地谴责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们，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针对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由同资产阶级秘密联盟变成公开联盟，针对着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业已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分裂局势，列宁指出，“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十五页。）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坚决地支持欧洲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勇敢地号召建立第三国际，代替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以便重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了。第三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 經驗和教訓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也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起来的。



恩格斯曾經說過，“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以彼此进行生死斗争的各种不同党派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五页。）

事实正是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些本来是统一的事物，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每一次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都把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使国际工人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团结。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最伟大的成果。

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会有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哪里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盛行起来，那里的无产阶级队伍就必然产生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次分裂，总是由于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反对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引起的。

什么是分裂主义呢？

分裂主义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谁要是反对和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谁要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党改变为资产阶级改良党，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谁要是实行违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纲领和路线，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列宁说过：“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那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而机会主义者“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三十三、三百三十五页。）

分裂主义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分裂无产阶级的团结，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就是要分裂无产阶级。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最恶毒的手法，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内购买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正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追求的不是



团结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在帝国主义最害怕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时候，出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

在共产主义队伍中，谁要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那么，即使他们处于暂时的多数地位，甚至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也还是分裂主义者。

在第二国际时期，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处于多数地位，而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分裂主义者显然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派，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派。

一九〇四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虽然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是分裂主义者。当时，列宁指出：“中央机构（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与党决裂”，“中央机构已自外于党。谁拥护中央机构，谁拥护党？中间立场是没有的”。（列宁：《给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的信》，《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四十五、四十六页。）

总之，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可以说，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修正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团结的斗争是同坚持原则的斗争不可分割的。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团结，是阶级的团结，革命的团结，反对共同敌人的团结，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斗争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国际无产阶级有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才会有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只有坚持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团结。放弃原则，同机会主义者同流合污，这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像列宁所说的，“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走狗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三十四页。）

列宁还指出，受资产阶级贿赂和扶植的机会主义流派，“在没有被‘消灭’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正像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因此，“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同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绝不能作原则的让步，只有同他们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极其宝贵的遗训，也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 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他们提出了一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硬要把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各国兄弟党，代替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兄弟党会议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抵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谁就受到苏共领导的打击。

正是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手制造了目前的严重的分裂危险。

苏共领导根本不是致力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把一个好好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得个乱糟糟。

他们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他们任意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进行颠覆活动，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兄弟国家。

他们假借所谓“国际分工”的名义，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苏共领导推行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苏共领导公开地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悍然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了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

苏共领导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片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份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他们挑起中苏边境事件，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赫鲁晓夫甚至不止一次地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表示，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党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赞扬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说什么这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行动。

所有这些恶化国家关系的严重步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手段。苏共领导居然还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试问：你们的这些行为，难道有一丝一毫国际主义的气味吗？

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假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力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其他兄弟党的领导。直到最近，他们仍然坚持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恢复团结的条件，作为“每个共产党必须遵守”的“原则”。①

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②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放在眼里，从来就习惯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他们任意撕毁兄弟党的共同协议，擅自对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

苏共领导破坏兄弟党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首先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接着又利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

苏共领导把兄弟党当作他们的外交棋盘上的小卒。赫鲁晓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调子转来转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

苏共领导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煽风点火，支持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者攻击党的领导，或者篡夺领导地位，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些兄弟党内制造分裂。正是由于苏共领导的这种分裂主义政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出现了组织上的分裂。

苏共领导还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体，违反杂志创刊会议的协议，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共领导还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国际民主组织的正确路线，在这些组织中制造分裂。

① 苏联《真理报》1963年12月6日编辑部文章：《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② 赫鲁晓夫1962年4月20日同美国《展望》杂志发行人考耳斯的谈话，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苏共领导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他们把本来应当对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苏共领导一心一意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把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可靠的朋友，而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敌人。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当苏共领导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抓到一根似乎是救命草的时候，自以为处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得意忘形，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妄想拿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作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的牺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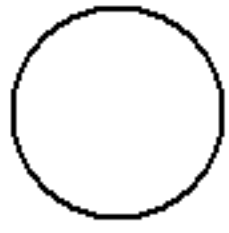
当苏共领导的错误政策碰壁的时候，当他们处境困难的时候，他们又恼羞成怒，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罪羊。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可以看到，苏共领导违反苏联人民的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苏共领导用自己的修正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来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相对抗。这样，苏共领导就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样，使自己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制造者，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制造者，也成为许多兄弟党内部的分裂制造者。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比之历史上和当代的一切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知道，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出现在列宁缔造的、世界上最有威望的苏联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苏联。多少年来，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共产党，都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斗争的榜样。苏共领导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利用列宁的党的威望，利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同时，他们又惯于使用两面手法，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分裂，口头上却叫喊“团结”、“团结”。这种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起着迷惑人们的作用。有不少人，就是由于对苏共的传统信任，由于不明事情的真相，没有能够及时识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正因为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說，苏共領導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人們已經看到，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大大地助长了修正主义在世界範圍內更加泛濫，給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帮了大忙。

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資產階級因素泛濫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詐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們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論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濫起来的資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撓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事实上，苏共領導已經博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热烈贊揚和喝采。

美帝国主义特別夸奖赫魯曉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他們說，“看来很清楚，赫魯曉夫要同西方求得和緩的願望是很真誠的，以致他願意冒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險来实现这一点。”<sup>①</sup>他們說，“赫魯曉夫已經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斯大林时代的統一集团。这也許是赫魯曉夫作出的最大貢獻——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貢獻，而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貢獻。”<sup>②</sup>“我們应当感謝他錯誤地处理他同中国人的关系。……我們也应当感謝他突然提出許多非常唐突的倡議，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混乱。”<sup>③</sup>

他們认定，赫魯曉夫是“西方可以期望与之打交道的最好的苏联总理，西方目前一定要設法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地位的任何行动”。<sup>④</sup>“美国政府現在相信，在赫魯曉夫同赤色中国的爭端中，美国应当給赫魯曉夫以最大限度的支持”。<sup>⑤</sup>

在給苏共領導捧場的啦啦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問題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領導的。他們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內恢复我們的运动。”<sup>⑥</sup>“我們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現在我們必須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sup>⑦</sup>他們宣布，“对于赫魯曉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們要給予批判性的支持”。<sup>⑧</sup>

① 美国《民族》周刊 1963 年 2 月 9 日文章：《为外交提供了机会——集团出現了裂縫》。

② 美国《新聞周刊》1962 年 3 月 26 日文章：《莫斯科和北京：裂痕有多寬？》。

③ 《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1963 年 9 月 30 日文章：《随着簽訂禁試条約——赫魯曉夫已經改变了行徑嗎？》。

④ 英国《泰晤士报》1962 年 1 月 17 日报道：《美国认为共产党的团結已成过去》。

⑤ 美国《新聞周刊》1963 年 7 月 1 日报道。

⑥ 托派的所謂“第四国际”重新統一代表大会 1963 年 6 月的決議：《国际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⑦ 美国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1956 年 4 月 13 日至 15 日通过的決議：《俄国革命新阶段和斯大林主义危机》。

⑧ 托派的所謂“第四国际”国际書記处 1961 年 12 月 5 日通过的決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领导撑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問題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問題上，他們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語言。这是因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綫，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

正如列宁所說，資产階級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別活动家来維護資产階級，比資产者亲自出馬还好”。（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零三頁。）現在，帝国主义老爷們正是怀着滿意的心情，让苏共领导来为他們破坏无产階級世界革命事业鳴鑼开道。

苏共领导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危險，但是他們却企图嫁禍于人，誹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什么“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捏造了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

在这里，我們认为有必要把苏共领导对我們的一些主要的誹謗，逐一加以駁斥。

### 駁所謂“反苏”

苏共领导把一切抵抗和批評他們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人，都叫做“反苏”。这是一个很吓人的罪名。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偉大列宁締造的党，这还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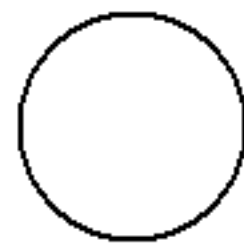
但是，我們劝苏共领导不要装腔作势，“反苏”的罪名無論如何也加不到我們身上。

我們还劝苏共领导不要自我陶醉，“反苏”的罪名無論如何也封不住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嘴。

我們中国共产党人，同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偉大的苏联人民、苏維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一直怀着衷心的尊敬和真誠的爱戴。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在列宁的党的领导下，点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火炬，开創了国际无产階級革命的新紀元，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最前列。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最偉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給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經說过，“兄弟党的代表对我們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給予我們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們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資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們党沒有辜負这种希望”。（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斯大林說列宁締造的苏联共产党沒有辜負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說得很正确。这个党贏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兄弟党的敬佩和支持，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大反斯大林，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能不能说他们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呢？这就不能这样说了。

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着共同的要求。这些共同的要求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实现这些要求，是“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恰恰背弃了这些要求，辜负了兄弟党的希望，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这不但违反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违反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

真正反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那么黑暗，那么可怕，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追求美苏合作，对美帝国主义那样百般奉承，那样卑躬屈膝，给伟大的苏联丢脸，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败坏了苏维埃国家的声誉，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反对和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玷污了列宁党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传统，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总之，正是苏共领导的所作所为，使伟大的苏联和苏共蒙受了奇耻大辱，使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这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自然不能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严正的批评。我们反对的仅仅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正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反苏”呢？

维护苏联和反对苏联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真正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于是否真正维护苏共、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严肃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正是维护苏联；反之，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反对苏联；追随和屈从这种错误路线，并不是真正维护苏联，而只能是帮助苏共领导损害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一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他还说，“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十九、一百五十页。）

遵照列宁的精神，我们正告苏共领导，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修正主义的错误，那末，为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团结，我们将继续“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你们。

### 駁所謂“爭奪領導權”

苏共领导把我们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说成是要“争夺领导权”。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苏共领导，你们说我们要“争夺领导权”，究竟是向谁争夺呢？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呢？难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凌驾所有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就在你们手里吗？

看来，苏共领导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凌驾全世界兄弟党之上的当然领导者。按照苏共领导的逻辑，他们的纲领、决议、声明，都是金科玉律。赫鲁晓夫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不管怎样错误百出，荒谬绝伦，都是圣旨。所有兄弟党只能俯首听命，恪守不渝，而绝对不



准許批評和反对。这是十足的霸道，十足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但是，我們必須告訴蘇共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是封建集團。所有兄弟黨，不論大黨小黨，新黨老黨，掌握政權的黨或者沒有掌握政權的黨，都是獨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沒有任何一次兄弟黨國際會議，也沒有任何一個各國兄弟黨一致通過的協議，規定兄弟黨之間有上級黨和下級黨、領導黨和被領導黨、老子黨和兒子黨的區別，規定蘇共領導是兄弟黨的太上皇。

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歷史上來看，由於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個或者那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曾經走在運動的前列。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英國的工聯運動和法國的工人政治鬥爭，曾先後處於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後，恩格斯說過：“現在德國工人是處於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列”。恩格斯還說，對於德國工人來說，“事變究竟容許他們把這種光榮地位佔據多久，這是不能預先斷言的”。“但是，首先必須維護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容許產生任何愛國沙文主義，並且歡迎無產階級運動中任何民族的新進展”。（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一書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頁。）

二十世紀初，俄國工人處於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前列，實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

列寧在一九一九年說過：“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中的領導權暫時（自然是在一個短時期內）轉到俄國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紀各個不同的時期中曾先後掌握在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的手中一樣。”（列寧：《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二百七十七頁。）

恩格斯所說的“前列”，列寧所說的“領導權”，決不意味着走在國際工人運動前列的這個黨可以對其他兄弟黨發號施令，決不意味着其他兄弟黨必須服從於這個黨。當德國社會民主黨處於運動前列的時候，恩格斯說過：“它沒有權利代表歐洲無產階級講話，特別是沒有權利講錯誤的話”。（《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第三百二十二頁。）當俄國布爾什維克黨處於運動前列的時候，列寧說過：“必須預計到其他国家發展的一切階段，決不要從莫斯科發號施令”。（列寧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黨綱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四十九頁。）

就是恩格斯和列寧所說的這種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長期固定不變的，而是隨着條件的變化而轉移的。這種轉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黨的主觀願望來決定，而是由歷史形成的各種條件來決定的。如果條件變化了，另外的黨就可能走在運動的前列。如果一個處於前列地位的黨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儘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響的，那就必然喪失前列的地位。過去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這樣。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經存在过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各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提議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經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問題，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历史表明，这个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誰有权领导誰的問題。兄弟党之間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問題，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徑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这些准则，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都有明确的規定。

苏共领导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把其他所有兄弟党都当作是被领导者，这是完全違反宣言和声明所規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

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每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已經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赋予已經胜利、特别是先取得胜利的党支援其他兄弟党的更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絕不是赋予它支配其他兄弟党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締造的党，也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設社会主义的党。按理，苏联共产党应当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傳統，肩負起支援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更大的义务，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正是考虑到历史形成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衷心地希望苏联共产党肩負起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會議上，曾經強調指出，社会主义陣营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苏共领导虽然犯了一些錯誤，但是他們毕竟最后接受了各国兄弟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宣言。我們提出的社会主义陣营以苏联为首的意见，也写入这个宣言中了。

我們认为，这种为首的地位，同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則并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負有更大的責任和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对于这个“为首”的地位，并不滿意。赫魯曉夫本人曾經多次对这一点大发牢騷。他說：“‘为首’在物质上能給我們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給我們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給我們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义上能給我們带来什么东西呢？給不了什么！”<sup>①</sup>他

<sup>①</sup> 赫魯曉夫1960年2月4日在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还说，“我們要这个‘为首’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为首’見鬼去吧！”<sup>①</sup>

苏共领导嘴里說不要“为首”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要求凌駕一切兄弟党之上的特权。他們不是要求自己在奉行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和履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义务方面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是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他們的指揮棒，跟着他們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們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話，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問題，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問題，不是究竟誰领导誰的問題，而是究竟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还是屈服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問題。苏共领导誣蔑我們“爭夺领导权”，实际上是他們坚持要我們和所有其他兄弟党服从他們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

### 駁所謂“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紀律”

一九六〇年以来，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慣用的一个論据，就是所謂“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紀律”。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們同苏共领导在这个問題上的爭論。

一九六〇年六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談中，用突然襲击的手法，散发了一个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并且糾合多数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他們的这个企图沒有得逞。但是，在这次会談以后，苏共领导就提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少数必須服从多数的論点，他們強調有几十个党的代表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要中国共产党“尊重”布加勒斯特会談中“一致表示的意見和意志”。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駁斥了这个錯誤的論点。中共中央指出，“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問題，究竟誰对誰錯，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終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終究不能把錯誤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終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錯誤。”

但是，苏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件中又重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謬論，并且引用列宁在《杜馬七人团》一文中的一段話，指責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見，实际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結”。

出席一九六〇年兄弟党莫斯科會議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會議上进一步駁斥了苏共領

<sup>①</sup> 赫魯曉夫 1960 年 6 月 24 日在布加勒斯特十二國兄弟党代表会談中的发言。



导的这种谬论。中共代表团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但在各个兄弟党之间则不能实行这个原则。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在这里既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更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对于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只能根据协商的原则，经过讨论，达成一致的协议。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显然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问道：“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一种超党的党章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曾经通过这样一种超党的党章呢？”

中共代表团接着揭露了苏共中央的信件在引用列宁《杜马七人团》一文中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问题的一段话的时候，竟然故意删去了原文中“俄国”一词，企图把一个党内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搬到兄弟党关系方面。

中共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党的内部，虽然在组织上必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能说，在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正确和错误，在任何时候都能根据多数和少数来加以判断。正是在列宁的这篇《杜马七人团》的文章里，列宁严厉地抨击了当时杜马党团中的七个取消主义者利用一票的多数压制少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卑劣行为。列宁指出，七个取消主义者虽然占多数，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先进的觉悟的工人大多数的统一意志、统一决议、统一策略，因而他们一切有关统一的叫喊都不过是十足虚伪的。列宁说，‘七个无党性分子要吃掉六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要把这叫做统一。’列宁还说，恰恰是杜马党团中的六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是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只有那七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

中共代表团还说，列宁的话表明，“甚至在一个党的一个小组里面，多数也不永远都是正确的，相反，有时多数也必须‘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何况是在兄弟党之间？苏共中央的同志这样连文义都没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地引用列宁的话，并且特意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字，可是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详细地引用中共代表团一九六〇年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几段发言，为的是说明，苏共领导攻击我们“抗拒多数的意志”的谬论，早就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正是由于中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这种谬论，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被写入一九六〇年声明中。

苏共领导直到现在仍然喋喋不休地叫嚷“少数服从多数”，这只能表明他们要否定各国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地位，取消兄弟党之间协商一致的原则。他们企图在“多数”的幌子



下，挟持一些兄弟党顺从他们的意志，并且利用这种虚假的声势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苏共领导这样做，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是违反宣言和声明的。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如果要说国际纪律，那不是别的，只能是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我们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破坏了这种必须遵守的准则。

如果苏共领导一定要分什么“多数”、“少数”，那么，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苏共领导，我们并不承认你们是多数。你们所依恃的“多数”是虚假的。真正的多数并不在你们那一边。难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党员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是少数吗？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严重地脱离群众，难道能够把不赞成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算在你们的所谓“多数”之中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谁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谁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谁反映他们的革命意志。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谈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的时候说道：“虽然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两个人对一百零八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百零八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零二页。）

今天，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包括那些暂时还没有觉悟但终究会觉悟起来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真正居于多数的，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背叛他们根本利益的一小撮修正主义者。

### 駁所謂“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诽谤我们说，“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现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共领导强制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接受了苏共领导强加给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或者由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苏共领导的鼓励，把本国革命运动引入歧途，使本国革命事业遭到损失。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追随苏共领导之后，摇旗呐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消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他们自己党内的广泛不满，不能不引起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对。

这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在他们自己党内，也依样画葫芦，实行分裂主义的政策。他们



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對於黨內的路綫分歧，對於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問題，不允許進行正常的討論，而且採取非法手段，排斥、打擊以至開除堅持原則的共產黨人。這就不可避免地使這些黨內兩條路綫的鬥爭帶有特別尖銳的形式。

從根本上說，這些共產黨黨內鬥爭的性質，是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綫同選擇修正主義路綫之間的鬥爭，是要把共產黨建設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無產階級革命黨同把共產黨變為資產階級僕從、社會民主黨變種之間的鬥爭。

蘇共領導在蘇共中央公開信中，歪曲了美國、巴西、意大利、比利時、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共產黨的黨內鬥爭真相。他們使用了最惡毒的語言，咒罵那些受到這些國家的黨的修正主義集團排斥和打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蘇共領導這樣顛倒黑白，難道能夠掩飾和改變這些共產黨黨內鬥爭的真相嗎？不能，不能，絕對不能。

就拿比利時共產黨的黨內鬥爭來說吧。

比利時共產黨的內部分歧，由來已久。隨着這個黨原來的領導集團越來越深地陷入修正主義的泥坑，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黨內的鬥爭越來越激烈。

比利時共產黨的修正主義集團，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亂事件期間，竟然發表聲明，譴責蘇聯幫助匈牙利勞動人民平息叛亂。

這個修正主義集團，反對剛果人民武裝反抗比利時殖民主義者的血腥鎮壓，贊成美帝國主義利用聯合國干涉和鎮壓剛果民族獨立運動。他們還不知羞恥地夸耀自己率先向聯合國發出呼聲，“要求迅速地、全部地執行聯合國的決議”。<sup>①</sup>

這個修正主義集團，贊揚鐵托集團的修正主義綱領“包含有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sup>②</sup>

這個修正主義集團，肆意詆毀一九六〇年聲明，說這個聲明的內容是混亂的，“每二十行字，就有一句違反這個聲明總路綫的句子”。<sup>③</sup>

這個修正主義集團，還在一九六〇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比利時工人大罷工期間，指責工人反抗軍警鎮壓是什麼“輕率的、不負責任的行動”<sup>④</sup>，瓦解工人的鬥爭意志。

對於這個修正主義集團一連串的反叛比利時工人階級利益、反叛國際無產階級利益的行為，以格里巴同志為首的比利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理所當然地要進行嚴肅的鬥爭。他們揭露和批判了黨內修正主義集團的錯誤，堅決地抵制和反對它的修正主義路綫。

由此可見，比利時共產黨內的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這兩條路綫的鬥爭。

① 埃·伯內爾就剛果問題答《人道報》記者問，載1960年7月26日比共《紅旗報》。

② 《紅旗報》1958年4月22日評論：《比利時共產黨與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

③ 讓·布魯姆1961年12月3日在布魯塞爾地區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轉引自《紅旗報》1962年2月22日格里巴的文章。

④ 讓·布魯姆：《爭取迅速獲得全勝：共產黨提出的兩項建議》，載1960年12月29日《紅旗報》。



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对待党内斗争的呢？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政策，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和排斥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共产党人。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听取格里巴等同志的意见，并且不顾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就非法地宣布，从党内开除格里巴等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比共原来的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为重建比利时共产党而斗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吗？

苏共领导公然支持和鼓励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排斥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正是兄弟党内分裂的制造者。

至于说到印度共产党，那里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我们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的文章里，根据大量事实，指出以丹吉为首的叛徒集团，已经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他们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正在按照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意志，把印度共产党改造成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尼赫鲁政府的僕从。

从那时以来，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全世界都看到，丹吉集团继续走着叛徒的道路。他们继续鼓吹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尼赫鲁政府“实现”印度的“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庞大的扩军备战预算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他们破坏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孟买发生的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尼赫鲁政府横征暴敛政策的大罢工。他们阻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员的群众大会。他们继续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们追随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随着叛徒面目的暴露，丹吉之流越来越遭到印度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丹吉之流是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民族的祸害。他们正在为重振印度共产党的光荣的战斗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他们是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希望。

苏共领导大肆喧嚷中国共产党支持“变节者”和“叛徒”，但是，支持像丹吉之流这样货真价实的变节者和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许多国家内敢于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一律咒骂为什么“变节者”、“叛徒”、“反党分子”。但是，这些共产党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无非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要有一个革命党和一条革命路线。难道苏共领导真的以为，咒骂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吓倒，就可以使他们放弃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不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吗？这种如意算盘，是绝对办不到的。



古往今来，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像很渺小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们最终总会胜利的。列宁和第三国际就是这样。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伯恩斯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就是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的。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坚决支持革命者，支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场。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同修正主义者还有来往，为什么偏偏不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往呢？苏共领导把我们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搞分裂主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以格里巴等同志为代表的比利时共产党人，以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等同志为代表的巴西共产党人，以希尔等同志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以库马拉西里、桑穆加塔桑等同志为代表的锡兰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坚持建设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党，坚持符合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理应博得一切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尊敬、同情和支持。

总之，在全世界，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

## 目前的公开论战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归根到底，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论战，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论战，就是要团结还是要分裂的论战。这种涉及根本原则问题的争论，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一段相



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兄弟党的内部会谈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苏共领导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领导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绝不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领导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他们说，他们发动公开论战“作得完全正确”<sup>①</sup>，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sup>②</sup>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间，越南劳动党建议“各党应当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绝了对停止公开论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公开的答覆。

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覆，但保留公开答覆的权利，为的是给已经商定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苏共领导竟然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进一步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七月十四日，当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采取了蛊惑人心的手法，使用了种种谩骂的语言，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苏共领导进一步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公开论战。

从七月十五日起，苏共领导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各种集会到发表文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从广播电台到电视节目，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以诽谤和攻击。根据对苏联中央一级二十六家报刊的统计，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一共发表了一千一百一十九篇编辑部文章、社论、短评、署名文章、读者来信、漫画等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至于苏联地方报刊，根据对加盟共和国十五种机关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在同一期间，也发了七百二十八篇反华材料。

对于这些反华宣传材料，凡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其中苏共中央公开信则先后全文发表了两次，并且用十几种外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供关心这场公开论战的人了解

① 赫鲁晓夫1961年10月27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② 苏联《真理报》1962年2月21日编辑部文章：《我们时代的旗帜》。



苏共领导的观点。只是由于苏方的反华文章数量极大，而且大都千篇一律，我們报纸的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发表。我們的出版机关已經把这些文章统统收集起来，編成专册，陸續出版。

苏联方面已經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按照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則，中国方面有权利发表相当的答辯文章和材料。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牵涉的問題比較多，关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原理，也关系到七、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許多重大事件，因此，我們《人民日报》和《紅旗》杂志的編輯部，經過認真的研究之后，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陸續发表評論。到目前为止，我們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評論，連本篇在內，才发表了七篇。

对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們还没有評論完。至于苏联中央一級报刊和地方报刊发表的大量反华文章，我們还没有答辯。

赫魯曉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回答新聞記者的时候，曾經提出停止公开論战。但是，在那一天以后，苏联报刊仍然繼續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論战，并且說，公开論战“給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損害”。我們要問苏共领导，过去，你們說，公开論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sup>①</sup>，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立場”<sup>②</sup>，你們一会儿这么說，一会儿那么說，究竟是要的什么花招呢？

我們还要問苏共领导，你們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們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辯文章，而且連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辯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辯，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則的嗎？你們說了那么久，說了那么多，我們才开始說了一点，你們就不耐煩了，就受不住了，就不願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討論的原則的嗎？

我們还要問苏共领导，你們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經說，如果中国人繼續論战，“那么，他們应当非常清楚，他們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說这样的大話，不是明目張胆的恫吓和威胁嗎？难道你們真的相信，只要你們命令一下，別人就会俯首貼耳，只要你們大喝一声，別人就会渾身发抖嗎？老实說，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們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領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們，朋友們，你們錯了，完完全全的錯了。

公开論战既然已經开始，就得按規矩进行。如果你們认为，你們已經說得够了，那末，你們应当也給对方足够的答辯机会。如果你們认为，你們还有许多話要說，那就請吧，請說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們說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說够。一句話，应当机会均等嘛。你們不是也說兄弟党是平等的嗎？为什么你們要什么时候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論战，

①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1961 年第 16 期編輯部文章：《走向共产主义的新的胜利》。

② 苏联《真理报》1962 年 2 月 21 日編輯部文章：《我們时代的旗帜》。





你們要什么时候停止論战，就剝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辯的权利呢？

苏共领导悍然挑起公开論战，扩大公开論战，坚持公开論战，現在又叫喊停止公开論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看来，事件的发展，出乎公开論战发动者的意料。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論战，正走向他們意願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沒有真理，他們在攻击別人的时候，只能依靠造謠污蔑，歪曲事实，顛倒是非，一旦論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他們站立的基础动搖了，他們害怕了。

列宁曾經說过，对于修正主义者來說，“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論上、綱領上、策略上和組織上的主要意見分歧了”。（列宁：《再論社会主义国际局和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十八頁。）

苏共领导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开論战的立場是众所周知的。我們一开始就认为，兄弟党之間的分歧应当通过內部协商来解决。公开論战，不是我們挑起的，也不是我們願意要的。

既然公开論战已經开始，而且苏共领导也說过，公开論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sup>①</sup>，那么，論战就应当在民主討論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并且要进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苏共领导公然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公然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們就不能指望我們不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不保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既然論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問題，那么，就必须把这些大是大非問題彻底弄清楚。这也是郑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問題的实质在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分歧。停止公开論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重大的原則分歧。相反地，通过公开論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辯明真相，分清是非，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論战的，怕論战的不是科学。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論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問題，促使他們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問題和世界革命問題。經過这场大論战，人們終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馬克思列宁主义。經過这场大論战，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将被調动起来，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到鍛炼，更加成熟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結合起来。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sup>①</sup> 苏联《真理报》1961年11月4日社論：《列宁主义的党的历史性代表大会》。



## 维护和加强团结的道路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分裂主义的立场。不管苏共领导怎样大声叫喊“团结”，怎样咒骂别人是“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只要他们坚持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搞假团结，真分裂。

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的这个立场，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才能建立起来。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谈不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坚持原则同坚持团结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绝不允许用阶级合作或者阶级投降代替阶级斗争，绝不允许用社会改良主义或者社会和平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允许用这种或者那种借口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而绝不允许用自己一个党的纲领代替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纲领。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划清敌我界限，就必须联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所有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反对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绝不允许颠倒敌我关系，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绝不允许从美苏两大国主宰世界的幻想出发，联合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反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各国革命人民。

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而不是假要团结，那么，他们就必须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绝不允许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来代替这些准则。这就是说：

必须遵守相互联合的原则，绝不允许纠合一些兄弟党打击其他兄弟党，进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活动；

必须遵守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绝不允许以援助为名，行控制之实，借口“国际



分工”，損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設社会主义；

必須遵守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則，絕不允許把自己放在其他兄弟党之上，把自己一党的綱領、路綫、決議強加給其他兄弟党，絕不允許干涉兄弟党的內部事務，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进行顛复活动，絕不允許把兄弟党当作自己的附屬品，把兄弟国家当作自己的附屬国；

必須遵守协商一致的原則，絕不允許挾持所謂“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一党的錯誤路綫，絕不允許利用自己的或者別国的党代表大会，通过決議、声明、领导人講話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別的兄弟党，甚至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总之，苏共領導如果真的要社会主义陣营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那就必須彻底拋棄他們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綫。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反对現代修正主义和現代教条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才能够得到維護和加强。这是維護和加强团結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当前的世界形勢，整个說来是大好的形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經取得了輝煌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国际階級力量的对比。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逆流的襲击，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合乎規律的現象。它虽然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某些兄弟党带来暫时的困难，但是，修正主义者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引起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件好事。

毫无疑问，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葆其美妙的青春，磅礴于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强大，更加团結；国际无产階級事业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必将获得更加輝煌的胜利。現代修正主义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

我們願意奉劝苏共領導冷靜地想一想，你們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究竟会給你們自己带来什么結果。我們願意再一次真誠地向苏共領導呼吁，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基础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則的基础上来，以便在原則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加强社会主义陣营团結，加强中苏团結。

尽管我們同苏共領導存在着严重分歧，我們对于在列宁和斯大林教导下成长起来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滿怀着信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始終不渝地維護中苏团結，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間的深厚友誼。

全世界共产党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結起来！



# 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重讀《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趙 汉

一九六二年八月，《紅旗》杂志重新发表了刘少奇同志在三十年代所作的著名讲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刘少奇同志在这篇著作中，論证了共產黨員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必須同时改造自己的原理，透彻地闡明了有关共產黨員修養的一系列問題。刘少奇同志的这篇著作，系統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进行党性修養的經驗，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說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少奇同志在这篇著作中指出，共產黨員应当在两种不同的境遇中鍛炼自己：一是“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鍛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養”；二是“要在順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鍛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養。”\* 他說：“革命实践的鍛炼和修養，无产階級意識的鍛炼和修養，对于每一个黨員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他要求我們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更要加紧无产階級意識的修養，始終保持純洁的无产階級的革命性。現在，我們党領導全国的政权已經十四年多

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溫这篇著作，重溫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指示，使我們感到分外的亲切。

## 做一个好的共產黨員 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党为中国人民革命而斗争的历史，是一部在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不屈不撓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我們共产党人，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前，主要地就是在那种異常艰苦的、有时甚至是失败的革命实践中鍛炼自己的。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旧中国的反动統治階級，既继承了国内几千年封建专制統治的衣鉢，又从国外輸入了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統治的經驗。他們瘋狂地迫害和摧殘革命力量，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同时动

\* 凡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員了一切反动的宣傳工具，恶毒地誣蔑和中伤我們的党，千方百計地欺騙群众，企图割断我們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無論在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或者在国民党統治区的白色恐怖下，我們共产党人长年累月都在經受着困难的考驗。长期的战争环境，敌人的軍警、特务、法庭、监狱和刑場，极度清苦的生活条件等等，都要求我們用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毅力来認真对待。沒有革命的決心、不肯为革命牺牲的人，不敢来加入我們的党。有些人，即使一时被革命浪潮卷进了党，到了斗争最尖銳、环境最困难的关头，如果不能站稳脚跟，也必然要被革命的浪潮重新冲刷出去。

在旧中国，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之間的斗争极其尖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犬牙交错，形势极其复杂，变化极其剧烈。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革命，不但要求我們共产党人要具备革命坚决、斗争勇敢的品质，而且要学会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学会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問題。刘少奇同志指出：“如果我們不能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武器，我們就不能正确地認識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問題，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場的危險，甚至可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只有努力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悉心調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且在革命的实践中认真地

探討失敗和成功的經驗，才能够在曲折复杂、变化多端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綫，在一切重大問題上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場。

所以，在革命胜利以前，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是很不容易的。他必須在同强大凶恶的敌人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加紧修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和革命能力。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在革命实践中锤炼自己，沒有坚强的党性，沒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就会落伍，就会被革命淘汰掉，就根本不配被称为共产党员。一个党，如果不是由这样具有坚强的党性的党员組成的，就不可能团结群众和打倒敌人，就不可能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那么，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就容易起来了呢？是不是就可以不必再加紧进行党性修养了呢？

当然不是这样。

的确，对于资产阶级政党來說，执政无非是意味着掌握国家机器压迫劳动人民，意味着可以公开地、合法地、为所欲为地营求他們这一政治集团及其后台老板的私利。因此，在那样的执政党中做一个党员，就可以升官发财、貪脏枉法，干一切对自己有利可图的事情。

我們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根本相反。我們的党是无产阶级领导其他劳动群众反对一切剝削和奴役制度的工具。我們党所謀求的，根本不是一党一派的私利，而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



說，在革命胜利以前，我們党的任务主要是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以夺取政权；那么，在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在继续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产生阶级的根源的同时，还担负着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责任。

毛泽东同志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及时地提醒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sup>①</sup>在取得胜利以后，我们党的担子是比过去更重、更艰巨了，我们党对党员的要求也比过去更高、更严了。如果认为在无产阶级的执政党中做一个党员比执政以前“更加容易”了，那显然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谆谆地教导我们：“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sup>②</sup>刘少奇同志也告诉我们，必须在成功和胜利的条件下保持严重的警惕。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经受不住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就会“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

他原有的革命性。”

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指出的这些危险，正是我们在胜利面前所必须经历的新的考验。

过去，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是被压迫者，这种被压迫的地位逼着我们要革命。现在胜利了。我们到底是把已有的胜利看成是新的起点而把革命进行到底，直到消灭一切阶级、一切剥削、以至解放全人类呢？还是陶醉于既得的成就，停顿下来，放弃革命的任务，松懈革命的斗志呢？当阶级敌人骑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把阶级的壁垒分得清清楚楚的，我们没有向敌人屈服过。现在，阶级斗争仍然在我们的周围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形势更加曲折复杂了，更加隐蔽了。我们是继续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牢牢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认真地考察和思索阶级斗争的各种现象，并且以自己的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呢？还是为和平的环境所麻痹，模糊阶级界限，丧失共产党员应有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征服呢？

过去，如果我们不和群众打成一片，不取得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不但不能战胜敌人，而且根本不可能使自己有立足存身之地。当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我们是继续诚心诚意地当人民的勤务员，竭尽全力来巩固和扩大

<sup>①</sup>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9、1440页。

<sup>②</sup> 同上，第1439页。



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呢？还是因为自己是执政党的党员就以功臣自居，以特权自许，同群众疏远起来呢？残酷的战争环境，使我们习惯于过艰苦的生活，习惯于进行紧张的战斗和劳动。现在环境安定了，生活也比过去好得多了。我们是继续发扬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呢？还是因为环境好了，就怕吃苦了，想享福了，好逸恶劳了，使自己的革命意志一步一步地衰退下去呢？

过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革命力量处在相对的劣势。只有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在斗争中不断地壮大自己和削弱敌人。现在革命力量空前强大了，我们的工作条件比过去有利得多了。我们是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使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呢？还是因为胜利就骄傲起来，不谦虚，不谨慎，不向群众学习，不认真做好调查研究，不注意到实践中去检验自己的主张，主观主义地处理问题呢？

这些都是经常摆在我们面前的关口，看我们过得去过不去。如果在胜利的条件下不能继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不起这些新的考验，显然是很难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由此可见，在取得政权以后，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同样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在胜利的条件下，必须继续进行党性修养，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才配得上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的称号。

## 共产党员在革命胜利以后 加强党性修养更为重要

共产党员在革命胜利以后必须继续加强党性修养，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政党所担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了。它肩负着巩固和加强国内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历史任务，也肩负着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积极参加国内和国外的阶级斗争。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基本上是党员头脑中的阶级斗争，它是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密切地联系着的。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各个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那么，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就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来侵蚀我们。我们进行党性修养，也就是反侵蚀，在反侵蚀的斗争中，不断地发扬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刘少奇同志说得好：“我们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是一回什么事呢？我认为这在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决不甘心死亡的，他们总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复辟。他们同



过去一样，总是把斗争锋芒集中在无产阶级  
的战斗司令部——共产党身上。在极大多数  
的人民群众热诚拥护共产党的情况下，在革  
命的人民已经在党的领导下高度地组织起来  
的情况下，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巩固的情况  
下，他们除了企图从外部来推翻党对政权的  
领导以外，同时还采取所谓“和平演变”的  
战略，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演变”上面。他  
们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溶化我们，使我们资  
产阶级化。他们想不动声色地偷天换日，使  
无产阶级政党从内部变质，实际上变为资产  
阶级政党；从而使党领导下的政权变质，实  
际上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一直到使整个社会  
制度变质，使资本主义复辟。南斯拉夫就是  
一个这样的典型。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无  
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并不是就注定不会遭到任  
何波折了。领导无产阶级取得这一胜利的  
党，在它的面前仍然摆着两种可能的前途：  
如果它始终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  
帜，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那么，它  
就能够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如  
果它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接受国内资产  
阶级的影响，就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的党，  
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就无产阶级执政  
的国家而言，也摆着两种可能的前途：如果  
它是由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领导的，  
那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  
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整  
个社会就将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如果它  
是由修正主义的党领导的，真正的革命力量

遭到了压制，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借尸  
还魂，革命就会失败。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取  
得政权以后，就只有自然而然地建成共产主  
义的前途而根本没有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的  
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有意地掩饰这一  
点，就是欺骗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  
为，无产阶级终究是要革命的，绝大多数人  
民群众终究是要革命的，因此，无产阶级革  
命是终究要取得最后胜利的。但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从来没有排除过无产阶级革命在某  
一发展阶段上（不论在取得政权以前或者在  
取得政权以后）有遭受挫折的可能性。这是  
一个异常尖锐和异常严重的问题。一切真正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政党，必须警惕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进  
行的。在这场斗争中，阶级敌人的首要进攻  
目标，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党，是我们共产  
党员。每一个敢于正视阶级斗争的革命者，  
都应当敢于正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  
斗争，都应当向自己郑重地提出加紧党性修  
养的任务。

### 新党员、老党员都应当 加强党性修养

刘少奇同志指出：“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  
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  
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  
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  
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





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这就是说，不论是新党员还是老党员，都应当加紧进行自己的党性修养。

老党员是我们党的骨干。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身上。他们不仅在工作中担负的责任往往比新党员更重，而且有义务以身作则，做出好榜样来影响和教育新党员，帮助新党员健康地成长。因此，老党员应当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更高的自觉性来进行党性修养。

老的一代开创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新的—代手里究竟是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要看新的一代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敌对阶级把他们的希望放在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蜕化上面，把腐蚀革命后代作为他们的战略任务。我们党则把培养革命后代当作自己的战略任务。每一个新党员，特别是年轻的新党员，都应当觉悟到这一点，刻苦地进行党性修养。

从新党员和老党员的具体情况来看，也都有着认真地进行党性修养的必要。

刘少奇同志曾经明确地指出了从比较幼稚的革命者成长为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者所必须经历的道路。他指出：由于这些同志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总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的残余；又由于他们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的实践，还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

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因此，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必须经过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

对于在革命胜利以后参加我们党的新党员来说，决不能以为自己在入党以前就从各个方面受到过党的教育和新社会的影响，并且进行过必要的思想改造，具备了一定的无产阶级觉悟，就可以忽视自己的党性修养了。

这是因为：第一，新党员中不少同志毕竟是在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在旧社会中，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在整个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列宁曾经指出：“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起就染上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sup>①</sup>我们决不可以低估这种思想在毒化人民群众方面所起的极坏的影响。我们决不能认为，共产党员一入党，就会马上把这种坏影响清除掉。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无疑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但同时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

<sup>①</sup>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0—261页。



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sup>①</sup>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脫胎出來的。因此，它不僅一般地帶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而且還不可避免地帶有封建宗法制度殘余的影響。幾千年的剝削制度留下來的大量惡毒東西，沒有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是打掃不幹淨的。因此，不僅生長在舊社會的人必須認真地同他從舊社會中帶來的惡毒東西做鬥爭，就是在今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長起來的人，也必須認真地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這種惡毒東西的殘余的影響作鬥爭。

第三，在新黨員中有許多年輕人，他們是在全國勝利以後長大的。這是他們的幸福。但是，老的一輩所親身受到的階級壓迫的痛苦，他們幾乎沒有受到過。老的一輩所親身經歷過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他們也很少經歷過。固然，在他們的身邊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但是，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曲折、複雜的，有時是隱蔽的，他們往往不容易察覺到。要使他們像老的革命一代那樣具有強烈的階級感情和鮮明的階級立場，顯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他們必須投入階級鬥爭的實踐中，經歷長期的鍛煉，才能辦到。

因此，一個革命者在入黨以前經過初步的思想改造，具備了一定的無產階級覺悟，並不能成為他們入黨以後放鬆黨性鍛煉的借口。一切真心想革命的人，從來都只把入黨當作更加自覺地接受黨的教育和改造自己的思想的一個起點。如果有人把入黨當作思想

改造的終結，恰恰證明他還沒有起碼的無產階級的覺悟。

有人認為，進行黨性修養主要只是新黨員的事情；入黨較久或者很久的老黨員，已經經歷了多次鬥爭的考驗，取得了比較豐富的經驗，可以不必再像新黨員那樣鄭重其事地進行黨性修養了。這種觀點對不對呢？

顯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這是因為：第一，我國在民主革命取得勝利以後，立即不停頓地轉入了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不但要徹底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一切舊制度，而且要徹底消滅遺留在人們頭腦中的、由這種舊制度所產生、為這種舊制度服務的一切舊思想、舊習慣，也就是說，要在人們的心理上最後地消滅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一切殘余。這是一次極為深刻的革命。

對於社會主義革命，我們黨的許多老黨員，是有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的。他們在黨的長期教育下，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能夠認真地加強黨性鍛煉，逐步建立起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立場和世界觀，樹立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到底的思想。他們有堅強的革命意志，立場明確，鬥爭勇敢，絕不動搖。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對於他們，終究是一件新的事業，有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經過不斷的努力，才能得到解決。因此，他們還需要在實踐鬥爭中繼續加強鍛煉，不斷地積累和豐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

<sup>①</sup> 《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頁。



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我们党内，也有一部分同志，虽然有革命要求，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他们的思想上是抽象的、模糊的，而他们思想中所残留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则常常会影响他们。存在着这种思想状况的同志，常常对新发生的问题认识不清，在革命的大风浪中甚至会表现出暂时的动摇。这些同志的好处是有自我改造的自觉性，当党指出他们的错误时，能够迅速地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站稳立场。还有一小部分同志，虽然经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由于过去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较深，始终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总是受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以后，他们的思想总是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表现出惊惶失措，左右摇摆，甚至站在非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对待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只有在经过党的教育、批判和帮助以后，才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为党工作。以上这两种同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此外，在我们党内，还有少数人，在参加革命前，受过很深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参加革命以后，实际上不愿意接受党的改造，坚持原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且企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是坚决的，因而还可以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为革命做一些

有益的工作。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革命发展到真的要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时候，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就会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人是完全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准备的，他们只是党的同路人。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有爱国心，还反对帝国主义，也还有一种模模糊糊要社会主义的倾向，因而党在对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也还要争取他们改过自新。只要他们认真改正错误，也还可以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工作；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就迟早免不了要同党分手，而成为蜕化变质分子。

由此可见，经历了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党员，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并不是都能够一样顺利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考验的。因此，我们老党员，在革命胜利以后，应当各自根据不同的情况，对自己提出加强党性锻炼的问题，加强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修养的问题，绝不能产生自满情绪，绝不能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丧失革命警惕性。

第二，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许多老党员在国家机关中担负了领导的职务，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会向我们捧场拍马、阿谀奉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内的某些同志，又可能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恶习，以致严重脱离群众，给党的事业带来损



失。我們共產黨員，無論職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都應該把自己看成普通勞動者，沒有任何特權，都必須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生活，和群眾同甘共苦。那種站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不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的做法，是國民黨作風。我們黨向來反對這種國民黨作風，不容許國民黨作風在我們隊伍中存在。我們共產黨員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是黨和人民分配給我們一份責任，叫我們挑起一副担子，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為黨和人民服務。我們挑起了這副担子，應該謙虛謹慎，兢兢業業地工作，才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如果一個共產黨員把這種關係搞顛倒了，把自己的位置擺錯了，那他就不能稱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老黨員必須加強党性鍛煉，繼續發揚我們黨的優良作風，嚴格防止沾染上國民黨作風。在任何條件下，在任何時間，都要保持住無產階級的本色，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終身不懈地奮鬥。

第三，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在複雜的國內和國際階級鬥爭的條件下進行的。階級敵人正在想盡各種辦法來腐蝕、溶化共產黨人。他們特別把注意力放在缺乏階級鬥爭鍛煉的年輕的一代上面。一個經歷過長期革命鬥爭風雨的老黨員，不僅有繼續在新的鬥爭環境中改造自己的任務，還擔負着培養繼承革命事業的新的新一代的任務。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任務。要把我們的年輕一代培養成為堅強戰士，必須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我們黨的革命

傳統，不是抽象的東西，它主要是通過老黨員在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的實際行動表現出來。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許多老黨員，在黨的教育下，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在對敵鬥爭中，他們英勇頑強，鬥爭堅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在對待原則問題時，敢于和善于堅持黨的立場，同一切違反黨的利益的現象作鬥爭；在工作中，艱苦奮鬥，廉潔奉公，謙虛謹慎，任勞任怨，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密切聯繫人民群眾；在個人生活上，勤儉朴素，安于清苦，嚴格地要求自己，不給組織上以任何的額外負擔。我們黨的這些革命傳統，是使我國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在革命勝利以後，老黨員有責任以身作則，繼續保持和發揚黨的這些革命傳統，繼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廣泛地宣傳和推行黨的革命傳統，並且採取循循善誘的態度，把革命經驗和革命傳統傳授給年輕人。這樣，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會不斷地取得新的勝利，我們黨的年輕一代，就會從老黨員的模範行為中受到感染、影響和教育，逐漸地在潛移默化中接受黨的革命傳統，逐漸地把自己鍛煉成為具有無產階級政治方向、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建設社會主義本領的革命接班人，而我們老黨員也才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而不愧為一個老的革命戰士。

總之，我們許多老黨員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確實具有豐富的革命經驗。但是，一個老黨員，經歷過較多的考驗，並不等於他



就注定能够经得起一切考验了。老的考验过去了，新的考验又出现了。新的考验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马马虎虎是通不过去的。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抓紧自我改造的时候，就可以比较自觉地发现和解决自己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进步也比较快。如果放松了思想改造，表面上好像平静无事，实际上，思想上的毛病却在逐渐发展，进步就一定很慢，或者没有什么进步，甚至倒退。对老党员来说，特别要防止那种认为改造得“差不多了”，“什么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的想法，防止在党性修养方面自满起来，疲踏起来，漫不经心起来。因为，每当我们不能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去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时刻，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趁虚而入和蔓延滋长的时刻。我们既然立志革命一辈子，就要时时刻刻用党性原则来严格要求自己。党龄长、资格老，对自己要求应该更高。古人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们应该借用这几句话来鞭策自己，勉励自己。

### 在参加革命实践和学习 革命理论中加强党性修养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锻炼和修养呢？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篇著作中，论证了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的关系，论证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的关系。他说：“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他又说：“我们共产党

员不能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这就是说，我们应当“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建立自己的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

参加革命实践和学习革命理论，是我们共产党人进行修养的两个最基本的方法，缺一不可。

群众的革命实践，归结起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我们才有可能改造客观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因此，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又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本身就是有阶级性的，决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这个道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还是动摇的？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应当依靠谁、团结谁、向谁作斗争？我们是否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一切符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现象，我们是不是全力支持？对于一切危害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现象，我们能不能敏锐地识破它的阶级本质，勇敢地进行斗争？我们置身于群众之中，是在努力扩大和加强无产阶级的影响和阵地，还是糊里糊涂地在帮助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扩大它们的影响和阵地？当我们自己



的头脑中出现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是揭露它还是把它掩盖起来，是向它作斗争还是让它来支配自己的行动？我们是自觉地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还是有意无意地去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很明显，只有在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中，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参加生产斗争的革命运动，是我们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少奇同志指出：“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人们的本身，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等，都是在社会的人们和自然界的长年斗争中不断地改造和进步的。”人们用自己的劳动来改造自然，而恰恰在这个改造自然的劳动中，创造了和改造着人们自己。

当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时候，生产斗争总是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的。通过生产斗争的革命运动，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生产斗争的知识，懂得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性，而且可以加强我们同劳动人民的联系，加强我们的阶级意识。大家都知道，人的思想意识，是由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所以，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农群众，同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无论在思想、感情、政治观点、道德观点以至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是互相对立的，而进行集体劳动的人，同个体劳动者在思想、感情、政治观

点、道德观点以至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在社会主义时期，积极参加集体生产，经常同工农群众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斗争，才能够培养热爱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工农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才有资格做他们的政治上的代表。

我们又为什么要在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进行锻炼和修养呢？

我国已经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在许多方面还是落后的，是同我们国家的需要和所处的地位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广泛地深入地开展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尽快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使我们能够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独立地解决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问题。我们是执政党的党员，应当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可能地有关科学知识的修养，在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起模范作用。我们分布在农业战线、工业战线、国防战线和科学技术战线上的广大党员，都应该参加一切可能和需要参加的科学实验活动。在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同非党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群众一道，总结科学实验的成果，并且有领导有计划地推广那些确实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有目的地引导广大群众参加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积极向群众传播科学知识，使广大群众认识到这个革命运动对于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有极大的好处，而乐于积极参加，使



广大群众自己掌握这种发展生产力的强大手段。

对共产党员来说，参加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和加强党性锻炼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我们认识和掌握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培养和加深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工作中建立严格的科学态度，学会运用科学方法来对待一切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是对立的，同各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对立的。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愈深刻，我们头脑中的唯心主义的残余就会愈少。从这个意义来看，积极参加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对于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具有重大的作用。

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都有一个树立科学态度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直接运用到我们每一项实际工作中去，更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所必须具备的党性。毛泽东同志一再地指示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sup>①</sup>，“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sup>②</sup>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性是同严格的科学性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用调查研究 and 典型试验的科学方法进行各项实际工作的革命运动，是改造我们的学风，改造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得以经常地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运动。

刘少奇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什么是我们的行动的指南呢？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什么是我们的理论武器呢？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共产党人进行修养的过程，必然同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过程。

学习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理想，没有方向，没有武装。为了革命，为了做一个好的革命者，我们必须认真地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请教，认真地向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请教。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经常任务，而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更是一项迫切的战斗任务。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着极其尖锐的斗争。现代修正主义

①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1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是帝国主义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适应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本国资产阶级的需要，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为了识破现代修正主义的假面具，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我们应当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百战百胜的武器，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讲的话，把现代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讲的话，同老修正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讲的话，进行仔细的对照、比较和认真的思索、研究，不断地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

参加革命实践和学习革命理论，是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革命能力，不断地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的重要方法。但是，无论参加革命实践或者学习革命理论，都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才能够真正接触思想，在锻炼和修养中取得好的效果。刘少奇同志向我们指出了一种很值得引起深思的现象：几个共产党员在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参加革命实践，同样地受到党的教育和训练，但是可能获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对于这种实际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刘少奇同志告诉我们，“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每个党员的思想改造贵在自觉。每一个人的头脑内部的矛盾，归根到底，要通过内在的自觉的思想斗争来解决。

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自觉，必须把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实践同进行党性修养紧紧地联系起来。在学习中，我们不能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实践中，又要时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检验自己的工作，总结自己的工作，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只有采取这种自觉的态度，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在学习和实践中产生真正深刻的变化。

修养要靠个人的自觉，同时，也离不开集体的力量。党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组织生活，同志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这样一种推动我们进行锻炼和修养，使我们不断地增强党性、及时地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的伟大的集体力量。这种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对党员进行监督的制度，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好传统。我们大家都应该珍惜它，维护它，发扬它，通过集体的努力，使我们在这样一种有高度原则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空气中，互相关心，互相规劝，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 and 广大群众觉悟的提高，我们党对党员的要求也更加高、更加严格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在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中自觉地改造自己，认真地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这篇著作，身体力行，加紧进行锻炼和修养，为永远保持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努力。





# 論我國農業的集約經營問題

· 趙 天 福 ·

在農業生產上，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是農業擴大再生產的兩種方法。在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過程中，農業的集約經營，是農業擴大再生產的根本路綫。在我国的具體條件下，農業集約經營的路綫更加具有重要的意義。

什麼是農業的集約經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在經濟學上，我們把集約耕作理解為資本在同一土地上的集中，而不是在并存各個土地上的分散”<sup>①</sup>。列寧在《關於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新材料》這一著作中，對此作了進一步的闡明。他指出：“農業集約化的過程，即以牲畜、機器、改良種子和改良耕作方法等方式投入每個單位耕地面積上的資本的增長”<sup>②</sup>。他還把單位耕地面積上投放的勞動力數量、肥料、農具、機器和牲畜的價值作為反映農業集約化程度的指標。馬克思和列寧在這裡所說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農業的集約經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同樣存在農業的集約經營問題，只是投放在土地上的投資，不是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作為榨取利潤的“資本”，而是作為國

家和集體為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而追加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農業集約經營的實質，就是借助於活勞動和特別是物化勞動的追加，借助於科學技術的應用，使一定面積的土地獲得最充分的利用的問題。農業集約經營意味著不斷擴張自然界利用的深度和廣度。它的任務是在不斷降低單位產品勞動消耗的同時，從每一畝既經利用的土地上，首先是耕地上，獲得不斷增長的農產品總量。

從農業生產發展的歷史看來，農業生產是不斷朝着集約化的方向發展的。在農業生產發展的歷史上，隨着農業生產條件的不斷改善，隨着農業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集約經營的水平也在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朝着集約化的方向發展，這是由土地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特點和社會發展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在農業生產中，土地是基本的生產資料，而這種生產資料作為一種自然體是不能用人力增加的。人們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不能利用的土地變成可以利用的土地，但是不能創造出新的土地。因此，農業用地面積

①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82頁。

② 《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頁。



的扩大，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在发展农业生产上，归根到底必须依靠集约化的方法。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又一个特点是，它在合理使用的条件下不仅不会变坏，不会磨损，而且会变得更好，生产能力更高。马克思指出：“丰度虽然是土地的客观属性，但在经济方面常常包含一种对农业化学发展状态和农业力学发展状态的关系，并且要跟随这种发展状态而变化”<sup>①</sup>。这就是说，土地的自然肥力虽然是土地的一种固有属性，但是，土地的经济肥力，即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的总和，却是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不断增长的。因此，土地面积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土地的生产能力却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sup>②</sup>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这一特点，就为依靠集约化的方法来实现农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

农业集约化发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由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列宁曾经指出：“在理论上，把任何数量的资本投入任何数量的土地都是可以设想的，自然，‘这要取决于’现有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等等，全部问题正在于这一个国家在这一个时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sup>③</sup>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个体农民为了增加产量，不得不在有限资金的条件下，从有限的土地面积中，依靠集约经营的方法提高农业产量。但是，小农经济的生产规模狭

小，经济力量薄弱，生产技术落后，因而对土地大量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不可能的。小农经济充其量只能依靠不惜浪费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和牲畜的力气与体质的可怜办法，在十分有限的程度内实行集约经营。列宁在驳斥“小农经济稳固论”时写道：“小耕作业是靠种种掠夺式的方法来支持的，如浪费农民的劳动和有生力量，浪费牲口力气和体质，浪费土地的生产力。”<sup>④</sup>由此可见，小农经济是不利于农业集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经济、技术和文化条件的进步，为农业集约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者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越地位，不断地采用新的技术来提高农业集约化的水平。最近二十年来，在有利于集约经营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营者，愈益把集约化当作获取超额利润和保持优越地位的主要方法。但是，应当指出，资本主义农业集约化的发展，不仅要以千百万中小农户的破产作为代价，而且也只能在有利于追求利润的目的的范围内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和

- 
-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1页。
  - ②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16页。
  - ③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1页。
  - ④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7页。



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与城乡对立，却又使农业的集约化经常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土地私有制使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者，不得不为租用土地或购买土地付出高额地租或地价。这就使可以用于农业生产上的大量资本流入地主的手中。土地私有制还使农业经营者不愿对土地进行提高土地肥力所必需的长期性的固定资本的投资，因为，这种投资一经固着在土地上，在租约期满不能从生产中全部回收投资效益时，就要无偿地落入地主的口袋里。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农产品价格下跌，生产资料却仍然在垄断财团的控制下保持着很高的价格，而地租、税金又仍须按租约和政府的规定如数交纳，这样，就迫使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者，在“生产过剩”和资金困难的压力下，不仅必须缩减耕地面积，也往往必须削减单位面积上的投资。例如，美国一九三〇年化肥的总消费量曾达到八二二点二万吨，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侵袭下，到一九三三年竟下降到四九〇点八万吨。一九五八年以后，美国农场的净收入减少，化肥的消费量几乎没有增加。由此可见，即使在物质技术条件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却远不能充分发挥这些物质技术条件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的作用。

不仅如此，资本家为了利润，还经常利用各种“科学”技术对土地的肥力进行掠夺，使自然资源遭受到难以挽回的破坏。美国的农业科学家们不只一次悲叹地指出，美国数亿英亩遭受严重水土流失的耕地，正在片面

地施用化肥追求利润的目的下加速其毁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不仅是劫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并且是劫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限定时间内增进土地丰度的方法的每一种进步，结果都成为丰度永久源泉的破坏上的进步”<sup>①</sup>。

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需在不断使用最新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说过：“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sup>②</sup>在社会主义农业生产中，提高社会主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道路，就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就是借助在先进科学技术不断利用的基础上加强农业集约经营。社会主义制度为农业集约经营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已经掌握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企业手里，生产的不再是为了私人的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土地成为全体人民子孙万代赖以生存、发展的宝贵财富。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农业集约化的发展才真正具有了无限广阔的前途。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9页。

<sup>②</sup> 《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第388页。



## 二

按照集約化的路綫发展农业，这对于我国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广大富饒的土地上，虽然有广大的可垦荒地可以开垦，但是，大部分荒地开垦起来还需要經過长期的勘察設計工作和龐大的基本建設工作。有些荒地虽然能够开垦，但是为了农、林、牧的正确結合，还需要有計劃地留作发展牧业和林业的基地。从另一方面看，我国虽然是一个具有精耕細作傳統的国家，但是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农业生产还是十分粗放，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很低的；就是已經精耕細作的地区，也还只是在比較落后的技术条件下，依靠手工劳动进行生产，因而单位面积产量也仍然較低。这就是說，我国全部已耕土地的增产潜力是很大的。因此，在适当开荒的同时，通过集約化的方法来提高我国原有农业用地，特别是提高原有耕地上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国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为实行农业集約經營，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創造了优越的条件。我国有几亿勤勞勇敢和具有无穷智慧的劳动人民，有数千年农业生产的宝贵經驗和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資源，如果再加上利用各种可能的先进农业技术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約化水平，就会使我国現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土地肥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得到迅速的增长。

因此，建国以来，党和政府虽然根据农

业增产和改进农业生产布局的要求，也十分重視荒地的开垦事业，但就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針來說，則一貫坚持通过集約經營来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根据这个方針，全国农民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支援下，在大力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为提高农业集約化水平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斗争，其中包括改良土壤，增施肥料，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扩大复种、間作、混作和套作面积，防治病虫害，进行工具改革，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实行农、林、牧結合等等卓有成效的农业集約化措施。为了打破“增产到頂”、“地力有限”等阻碍农业集約化的保守观点和探索集約耕作的經驗，党和政府还提倡各地农民和农村干部建立“試驗田”、“丰产田”等集約化耕作的样板。与此同时，国家还实行了增产不增稅、增产不增购或增产少增购等有利于农业集約經營的农业稅稅收政策和农产品收购政策。

由于党和政府积极帮助农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从工业、商业、財政等各方面支援农业，我国农业的集約化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以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为例：全国耕地的复种指数，一九五二年为一三〇点九，一九五七年增加为一四〇点六。耕地的灌溉面积，一九四九年为二点四亿亩，一九五七年增加为五点二亿亩。粮食作物的良种推广面积，一九五二年不足粮田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五，一九五七年已經达到百分之五十五点二。棉花良种的推广面积，同期内扩大了将近一倍，一九五七年全国已有百分之九十三点



九的棉田实现了良种化。每百亩耕地面积上平均的大牲畜头数，一九四九年有四点一头，一九五七年增加到五头。每百亩耕地面积上平均的猪的头数，同期内由三点九头，增加到八点二头。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方面，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化肥的年供应量增长了五点一倍，农药增长了八点九倍，农药械增长了近一点六倍，双轮带犁增长了九十四倍，排灌动力机械的马力数增长了十九倍。国家每年供应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价值，同期内增长了一点三倍。

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在保证我国农业总产量的稳步增产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二五，但粮食的总产量则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一，棉花的总产量则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六十九，农业总产值则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点一。这就证明了，我国建国以来所实行的农业增产的路线是十分正确的。

我国农业集体化的胜利，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农业集约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有利条件，为我国农业实现以现代化技术操作为主的农业集约经营创造了前提。在全国农业集体化以后，党和政府总结了各地的农业增产经验，研究分析了我国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各种有利条件，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了全国各地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的奋斗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各种集约化措施。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

下和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国农田水利的建设和现代化生产资料的供应都获得了更加迅速的增长。例如，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三年中有效的灌溉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三亿多亩，排灌设备增加了八倍左右，拖拉机增加了两倍左右，“农业八字宪法”在广泛的实践中更加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所有这些，使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进一步得到了提高。特别是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同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党的这一伟大号召对于推动我国农业集约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全党全民对农业大力支援的大好形势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同时很好地总结和运用农业集约经营的经验，充分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我国的农业技术改革，就一定能够以快速的步伐前进，我国农业集约化的



水平，就一定能够很快地提高。在今后不需要很长的时期内，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目标。

### 三

根据我国十多年来农业集约经营的经验，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为了使我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进一步迅速提高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今后在农业集约经营方面，必须注意全面地讲究经济效果。

社会主义农业集约经营的经济效果，包括着单位面积土地利用的效果和单位劳动时间（包括物化劳动时间与活劳动时间）消耗的效果这两个基本方面。前者效果的大小，用单位面积产量来衡量。单位面积产量高，土地利用的效果就大，单位面积产量低，土地利用的效果就小。后者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单位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产量多，或单位产品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较少，则劳动生产率高；单位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产量少，或单位产品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较多，则劳动生产率低。向一定面积的土地上追加投资，只要所采取的措施在农业技术上是合理的，它总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是，它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则要取决于追加投资的耗费与增产幅度的对比关系。如果增产的比例大于追加投资的比例，则不仅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如果增产的比例等于或小于追加投资的比例，则虽然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而劳动

生产率不一定就能提高，甚至还会降低。

从农业集约化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是不断提高的。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一定面积的土地追加投资，不仅会带来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必然会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消耗。那种认为对一定面积的土地继续追加投资，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土地报酬递减律”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为了促进农业的集约经营，必须同这种反动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同时应该看到，在农业的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不可能大幅度地提高。在技术条件还没有很大改变的情况下，对一定面积的土地过多的追加投资，虽然能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不一定也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是否应当向土地追加投资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具有重大的国民经济意义。片面地强调劳动生产率而忽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其结果必然导致在生产上不能发挥劳动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潜力，降低农业增产的速度。

但是，在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也决不应把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看作是无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能降低生产成本，就不能进一步满足提高集约化水平对于资金和劳动力的需要，从而也就不利于单位面积产量的进一步提高。



那种不考虑劳动生产率，不计成本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在对土地追加投资时，必须根据国家 and 企业的需要与可能，对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两方面的效果加以统一考虑，力争做到使两方面的效果都能得到必要的提高。

在考虑投资的经济效果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投资关系会存在矛盾。有些投资措施，例如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增施化学肥料等，相对的有利于减少活劳动的投放，甚至能够绝对的减少活劳动的消耗，但需要投放较多的物化劳动，即生产资料；有些投资措施，例如增施农家肥料，增加田间管理用工，增加简易农田基本建设等，相对的有利于减少物化劳动的投放，但需要投放较多的活劳动。在处理这种矛盾时，应当根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供应情况。在劳动力相对不足而生产资料或资金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应当把能够减少活劳动更多增加物化劳动的投资措施放在主要地位。在生产资料或资金相对不足而活劳动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采用能够相对减少物化劳动更多增加活劳动的投资措施。从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物质技术条件的加强，在农业生产的投资中，物化劳动的投放将日益居于主要地位。但是我国目前，生产资料，特别是需要用现金购买的生产资料，还受着资金积累和工业发展水平的限制，相对的不能满足需要，而农村的劳动力资源却十分富裕。因此，在选择追加投资的方法时，应当更多地注意相对地减少生

产资料的支出，用相对宽裕的活劳动来代替一部分相对不足的物化劳动。这样，不仅能够更快地促进当前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高，而且能够充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在考虑追加投资的经济效果时，还存在着长远效果和当前效果的矛盾。例如，在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把资金和劳动力更多的投放在当前农业生产上，有利于当前的增产，但不利于具有长远经济效果的水土保持工作的进行。反之，把资金和劳动力更多地使用在水土保持工作上，从长远来看虽然经济效果很大，但是影响了当前的增产效果。在处理这种矛盾时，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对可能使用的劳动力和资金，在当前生产和长远建设上进行统筹安排，使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互相结合起来。

在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时，还应当考虑投资的多少和收效的大、小与快、慢问题。大型的或高标准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入生产后，增产增收的效果较大，但是投资较多，技术条件要求较高，建设时期也较长。小型的或简易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入生产后，往往增产、增收的效果较小，但是它具有投资少、技术条件要求低、而建设时期又较短的优点。在处理这种矛盾时，应当根据资金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和国家对于增产需要的迫切程度来考虑。在我国目前时期，资金和技术的力量都尚有限制，而国家对于农业增产的要求又很迫切，因此，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时，应当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一般的要



首先選擇投資少、收效快的措施。這種措施，在生產上雖然發揮的增產增收作用可能較小，但是，一方面，它投資少，易于興辦，便于發揮群眾的力量，普遍開展；另一方面，它能較快地投入生產，較早的發揮增產、增收的效果。當然，在優先進行小型農田基本建設工作時，對於大型的農田水利建設工作，也不應該忽視，而應該根據生產發展需要和資金、技術力量的情況，分別緩急，有計劃地進行安排。

由此可見，農業集約經營並不是簡單地對土地追加活勞動和生產資料。它必須既考慮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又考慮提高勞動生產率；既考慮活勞動的消耗，又考慮生產資料的支出；既考慮當前經濟效果，又考慮長遠經濟效果；既考慮投資收效的大小，又考慮投資收效的快慢。只有全面考慮這些要求，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地安排追加投資的方式和方法，才能正確有效地進行農業的集約經營。

黨和政府根據農業集約經營必須全面講究經濟效果的要求，不斷強調在農業生產建設中必須加強勤儉辦場、勤儉辦社的思想，必須在發揮革命幹勁的同時，加強科學的經濟核算思想。對於農業生產上的每一筆投資，每一項措施，都要求既算增產賬，也算消耗賬；既算節約勞動力的賬，也算節約現金開支的賬；既算勞動生產率和每個勞動日增產增收的賬，也算每個勞動力利用率和每個勞動力全年增產、增收的賬；既算當年增產、增收的賬，也算長期增產、增收的賬；

既算增產增收效果大小的賬，也算投資多少與收效快慢的賬。我國農民在黨和政府的指導與幫助下，根據切身體會，已經逐步提高對核算投資效果的重要性的認識，逐步提高了經濟核算的工作方法。今後在鼓足沖天幹勁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經濟核算思想，將肯定會使我國農業集約化的發展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 四

為了使我國農業的集約經營獲得最大可能的經濟效果，不斷提高農業集約化水平，必須採取經濟有效的有利於農業集約經營的措施和提高農業集約化水平的途徑。在我國當前時期，需要特別重視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開展農業企業的多種經營。

農業生產有強烈的季節性。在生產過程中經常出現勞動過程的間斷。這種間斷“不是勞動過程由勞動力自身的自然限制引起的中斷……，而是由生產物及其形成過程的性質引起”<sup>①</sup>。因此，農業生產在一個季節里對於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需要很多，在另一個季節里則需要很少。如果按某一種作物生產的農閑季節來配備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就會遠遠不能滿足農忙季節的需要，嚴重地影響農業生產；如果按其農忙季節來配備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就會在農閑季節造成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很大浪費，嚴重地影響勞動力利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1頁。





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办法，就是在进行农业集約經營的过程中，有计划地开展农业企业的多种經營，把各种需要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設備但在時間上不一致的副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正确地結合起来，做到使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設備合理地充分地使用，使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設備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农业集約經營。

多种經營不只是克服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差别，均衡有效地利用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設備的良好方法，也是提高土地利用效果的有效方法。土地利用效果的大小，不只是表现于企业平均每一亩耕地上的农作物产量，而且还往往表现于企业所拥有的每一亩农业用地的各种农副产品总量上。任何单一的生产活动，都不能使企业土地利用的效果达到可能的最高水平。只有把农、林、牧、副、漁各种生产活动同时开展起来，才能使一定面积的土地上生产出最大可能的产品数量。

多种經營又是改善土地肥力的一种經濟有效的方法。例如，进行农、牧結合就能够最經濟地供給土地以丰富的有机肥料。

多种經營还有许多其他好处，如使农业企业中原来許多沒有多大使用价值的农副产品，轉化成为非常有用的产品，使农业企业能够更多更及时地获得現金收入等等。

由此可见，只有开展多种經營，才能使对一定面积的土地不断追加劳动力和生产資料在經濟上成为可能，才能为农业集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开辟道路。

但是，应当指出，并非任何样式的多种經營都是正确的。首先，在我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就全国一般地区來說，多种經營必

須优先保证粮食的增产；就棉花和各种經濟作物的商品产区來說，必須保证这些作物产量的增产。不根据国家計劃的需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和資金，去开展次要的多种經營活动，当然是不正确的。其次，农业企业的多种經營必須以农业、畜牧业互相結合为基础。因为，农业和畜牧业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个基本部門，只有充分发挥它們之間的相互促进作用，农业集約化才能有真正巩固的基础。最后，开展多种經營活动必須精打細算，讲求实效，根据劳动力、資金和当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逐步发展，避免脱离实际、不分緩急、百业俱兴、同时上馬的分散人力、物力、財力的錯誤作法。

第二，采用现实可能的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

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追加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經濟效果，同采用什么样的农业技术措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落后的农业技术条件下，对土地大量的追加劳动力和資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一定是經濟效果較低的。因此，不断地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就成为农业集約經營的必要条件。

我国农业生产的实践經驗证明，在我国現有的生产条件下，农业的增产潜力还是很大的，只要我們加强农业技术措施和不断采用现实可能的先进农业技术措施，我国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就可以大大提高。許多事实說明，許多地方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經濟条件和其他地方差不多，但是，单位面积产量却大大高于其他地方。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十分重視具体的农业技术措施的加强，并在现实



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如果其他地方也像这些地方一样，注意加强农业技术措施和积极采用现实可能的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那末，我国农业的增产潜力，就可以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更好地发掘出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就能够保持稳产和高产。

在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方面，我国农、林、牧、副、渔各个生产部门，已经积累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先进经验。在农业增产措施方面，毛泽东同志所总结出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这方面的最突出的代表。“农业八字宪法”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实行农业集约经营、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措施时，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科学地加以运用，只有这样，农业集约化的经济效果才能够得到最大可能的提高。

为了使各种先进技术措施的追加投资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一、多种技术措施正确地结合。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是动物、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它们的成长发育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孤立地采取部分技术措施，保证其部分条件，而忽略其他必要条件，就会使投资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无论农、林、牧、副、渔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在追加投资时，都要求根据其动植物生长发育的特点，采取有利于动植物生长发育的综合技术措施。“农业八字宪法”的主要精神之一，就是揭示了在农作物栽培的技术措施上，必须“土、肥、水、

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统筹兼顾。这就要求在安排劳动力和资金的追加投放时，必须对各种技术措施的要求都给以适当的保证。

二、掌握各项技术措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合理限度。从农业生产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农业技术措施的应用是有限度的。但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各项农业技术措施又分别具有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限度。超越了这种限度，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就不合理。例如，密植这一措施，在有关农业技术措施的充分配合下，在农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可以适当地提高密植程度。但是，在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一定的劳动力和资金的条件下，过分密植，就可能达不到增产的要求。即使可以增产，但在经济上也可能失去实际意义。因此，在运用各种农业技术措施时，必须掌握其在现实条件下的合理限度，做到合理深耕，合理密植，合理用水，合理施肥等等。

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确定应当采取的重点技术措施。各种技术措施对农业的增产意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是大不相同的。在对各种技术措施追加投资时，应当首先保证经济效果最大的技术措施的需要，然后照顾到其他措施。例如，在易涝或易旱的地区，水利措施具有突出的经济效果；雨量充沛、生长期较长的地区，增施肥料具有突出的经济效果；底层土壤好、表层土壤差的地区，深耕具有突出的经济效果；水、肥、土条件较好、生长期长的地区，密植、套种、复种等措施具有突出的经济效果，等等。因



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抓住关键性的技术措施优先投资，这是保证农业集约经营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原则之一。

第三，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建立农业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使一定面积的土地经济有效地容纳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就必须不断提高各种技术措施应用的技术限度和经济限度。这在我国现有的农业技术基础上是不容易普遍办到的。为此必须实现整个农业技术条件的根本改造，为我国的农业建立新的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包括着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等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各个方面。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终要求来看，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是主要环节和主要标志。因为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手段——劳动工具——的现代化。它的作用不仅是直接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而且也是实现水利化和化学化的必要条件。没有机械化生产工具的直接应用和机械化所解放出来的大批劳动力，要在我国实现水利化固然是难以设想的；就是要实现高度的农业化学化，如施用化肥，化学除草，化学防治病虫害等，也是困难的。因此，只有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才能有利于促进“四化”的全面实现，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总量。

当然，要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经济效果，也必须要有水利化和化学化的配合。只有根据国家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使它们发展的步调尽可能地协调起来，才能

在农业生产上保证“农业八字宪法”的各项措施综合贯彻，收到相得益彰的成效。

但是，由于我国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投放在农业技术改造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有限的，而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又大不相同，“四化”的各个方面在这些不同地区所表现的经济效果又大有差异，因此，在实现农业“四化”的步骤上，也应当因地制宜，有所区别。

在地形复杂和精耕细作水平较高的地区，在适宜于这里的农业机器尚未解决之前，在集中力量解决农业机械器的同时，化学化，主要是化肥化，宜于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这些地区使用化肥的优点是：

一、它能直接大幅度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根据我国的经验，在目前农村施用农家肥料的一般水平的基础上，一斤化肥（硫酸）可以增产粮食（水稻、玉米）四斤左右。在一定限度内，在单位面积上继续增施化肥，可以继续按同等效果起到直接增产的作用。

二、它能显著节约劳动消耗。在目前施肥水平条件下，我国农村积肥、送粪、施肥的用工，一般占全年用工总量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如果进一步提高施肥水平，用工量所占的比例还要大大增加。如果在增施有机肥料的同时，增施部分化肥，就能够节约大量的劳动消耗。

三、它的使用技术容易掌握，便于推广普及，收到实效。

有些同志认为，施用化肥会造成对土壤肥力的掠夺，会使土壤盐碱化。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农业经



营家为了追求利润，竭力掠夺土地肥力，就片面地使用化学肥料。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将不会单纯地使用化学肥料，目前更谈不到单纯使用化学肥料。此外，使用化学肥料不仅使籽粒增加，而且能够促使植物的茎叶繁茂，这样，就会进一步为增加土地的有机质提供有利的条件。在有机质和化学肥料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土壤的肥力不仅不会遭到破坏，而且必然会不断地提高。

在我国广大的水田地区和易旱易涝地区，水旱灾害是农业生产的最大威胁。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虽然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抗旱抗涝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我国对于水旱灾害的控制能力仍然很低，每年仍然有几千万亩到数亿亩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我国水利建设的经验证明，在这些地区如果能够很好地做到及时排灌，化水害为水利，就不仅可以大大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且可以有效地克服经常旱、涝失调和“靠天吃饭”的局面。因此，水利化在这里具有保产和增产的双重经济效果。水利一向被视为农业生产的命脉。这就决定了在这些地区，必须把水利化作为农业技术改造的先行。

这些地区一般又都拥有丰富的地上水或地下水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且具有长期同旱涝灾害进行斗争的宝贵经验。目前我国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和机器排灌的物质技术问题又已经获得基本解决。所有这些有利因素，将会使得今后在这里投资于水利建设，发展现代化的机器排灌事业，能够收到更加显著的经济效果。

在地势平缓、人少地多、劳动力和畜力

比较紧张的粗放农业地区，田间作业的机械化是当前提高农业集约化经济效果的主要关键。因为第一，这些地区土地连片，作物单纯，作业地块较大，便于我国当前可以大量提供的农业机械（主要是大型拖拉机和其牵引农具）发挥效率，有利于降低机器作业的成本。其次，由于劳动力不足，这里原有的耕作基础比较粗放，使用大型农业机具能够满足当地农民对于作业质量的要求。第三，在这里使用机器提高田间作业的劳动效率，可以节省出当地十分缺乏的人力和畜力，进一步提高精耕细作水平和扩大耕地面积，从而可以显著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总产量。因此，在这些地区，优先发展田间作业的机械化，就会收到更大的经济效果。

至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中城市郊区和集中的商品粮、棉基地，国家可以集中力量重点扶持，这些地区的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可以在全国先走一步，以便为将来在全国大规模推行“四化”积累经验。

应当强调指出，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决不只是一些生产安排和技术措施的经济效果问题。没有不断巩固发展的集体经济，不善于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任何在计算上具有经济效果的出资方式，都会在实际上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此，在考虑我国农业集约化的问题时，任何时候都应当把巩固发展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提高农民群众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



# 提倡现代剧

何明

在我们国家里，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深入，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戏剧，也开始了一个革命的变革。这个变革的主要内容是：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现代剧，要起而争夺历史赋予自己在舞台上的主要地位。这是舞台上一个革命。

由于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前一时期的舞台上，仍然是表演帝王将相、丫环小姐的旧剧占居主要地位。这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不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变了，时代变了，观众变了；戏剧的状况也必须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

基础，为现代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现代剧的产生和发展，又必然反过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在顽强地起作用，所以，现代剧对于旧剧的舞台地位要取而代之，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看来，“取而代之”的条件已经基本上成熟了：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现代剧，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

都掌握了大量观众，广大的戏曲工作者，也积极地为推陈出新作出了很好的成绩，创造了許多宝贵的经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万事万物都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的，戏剧当然也不会例外。当着现代剧要起而取代旧剧的主要舞台地位的时候，当着广大观众欢迎现代剧、广大戏曲工作者决心当促进派的时候，也出现了它的对立面——摇头派。

非难和否定现代剧的人，可以为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从戏剧必须为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基本观点来看问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剧，要让它占居舞台的主要地位，因为它是反映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历史上一切文艺作品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的新内容。所以，不论历史上有多么优秀、多么丰富的遗产，也不能代替我们今天的创造。这是不是“题材决定论”？不是。因为，谁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断言，以历史为题材的剧就一定不好，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剧就一定好；问题是，第一要看政治内容，第二要看艺术水平。不过，说到这里，还只是说到问题的一半。事情还有更重要的一半：好的历史剧可以古为今用，但是，究竟不能起到直接推动当前革命运动的作用；历史剧题材的局限性是不能不承认的。

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现代剧，是以今天的现实生活为题材，以今天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作为艺术的创造源泉，它是直接推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武器。它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鼓舞人们



正确对待和积极参加当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它所塑造的体现着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形象，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在培养共产主义新人方面起着重大作用。旧剧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吗？充满着封建观点的旧剧，不用说对于人们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改编出来的旧剧（这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应该把它摆到适当的地位），虽然会给人以历史知识和智慧上的启发，但也难以起到直接推动当前革命运动的作用。例如，能够让观众从改编的《将相和》，或新编的《武则天》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学到共产主义道德吗？显然，这是做不到的。

我们不能让古人带有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如果硬要机械地以古喻今，那就会走上把古人现代化的道路。结果既歪曲了历史，又歪曲了现在。只有当现代剧在舞台上占居了主要地位的时候，两相对照，今昔对比，好的历史剧才能在教育人民方面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提倡现代剧，这是整个戏剧改革的主流；而改编传统的历史剧，只能是支流。否则，老是在老主题、老故事、老框子里打圈子，结果，必然使艺术停滞不前，脱离时代精神，脱离人民的火热斗争。这对于艺术的发展，也是很不利。

艺术性太差——现代剧的艺术性是不是太差？各个阶级都有各自特殊的审美观点；我们希望那些用艺术性太差来非难和否定现代剧的人，不要用陈旧的审美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戏剧，不要总是在习惯势力的支配下随便下判断。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进步。”我们今天的现代剧，创造了许多感人的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反映了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概括了生活的矛盾和斗争，有着深刻的革命的主题，在戏剧史上写下最辉煌的一页。这种戏剧是有相当高的艺术性的；这种革命的艺术经验，是历史上一切戏剧还没有提供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许多现代剧已经十全十美了；而是说，不应当用旧的艺术标准去衡量它。我们并不否认，有些现代剧，就其艺术性来说，可能还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例如在表演技巧上，在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上，可能还不及某些传统剧目成熟。但问题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熟悉戏剧史的人都知道，优秀的传统剧目，并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完美的艺术性，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期的许多人的加工过程。人们有什么理由对现代剧的艺术性横加指责呢？一个革命者，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现代剧，难道不应该采取热情地关心、爱护和促进的态度，使它迅速地艺术上成熟起来吗？

关于艺术性，还有一个问题：有人对以旧剧形式演新内容的现代剧，特别反感。他可以给你举出若干条所谓形式和内容不协调的例子来，作为非难现代剧的根据。其实，这里头包含着他们的不少偏见。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某些以旧剧形式演新内容的现代剧，确实还多少存在着一些形式和内容不够协调的缺点。但是，这里还是作为一个革命



者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采取积极的促进的态度，帮助有关方面总结经验，更好地利用、改造旧形式，使形式和内容逐渐协调起来呢？还是采取消极地站在一旁，冷言冷语，或者漠加反对的态度呢？

一般说来，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内容起着主导的作用。我们相信，体现着社会主义思想内容的现代剧，是能够成功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的。一方面由于反映新内容的需要，在形式上必然会有新的探索、突破和革新。另一方面在打破了旧形式的束缚后，将会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新形式。有一些古老的剧种，由于表现新人物、新生活的需要，已经在开始创造新的表演技巧和程式。事实证明，那些经常演现代剧的许多剧种，不但可以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也可以创造新形式。这样，就既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又能改进自己的不足，在艺术实践中，放出新的光彩。我们希望，在广大戏曲工作者积极创作现代剧、许多剧种已经获得了较成功地演现代剧经验的时候，真正关心它的艺术性的人们，应该是努力帮助有关方面总结这些经验，使之更加完美，而不是消极指责，一味摇头。

列宁说过：“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强大有力，这样富有推动力量，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无论是新的或旧的形式……。”<sup>①</sup>

列宁这段话不是针对戏剧改革说的，但

它的基本精神，对于戏剧改革也是适用的。我们可以说：以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为内容的现代剧，以及以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为内容的现代剧，既然它的内容“这样强大有力”，“这样富有推动力量”，那么，它当然也能够成功地改造、利用和征服一切旧形式。

在我们国家里，有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现实基础，有非常丰富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经验，又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强有力的指导，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剧，将会比较迅速地改造和征服新形式；也能迅速地改造和征服旧形式。

这样，我们的现代剧就能取得并且巩固自己在舞台上的主要地位；而取得和巩固了这种地位，它就会在思想战线上发挥巨大而又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

这样，我们的各个剧种，我们的各种戏剧形式，也会健康地、蓬勃地发展起来；我们的各种戏剧表演者，也会在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社会主义事业、为戏曲的百花齐放，做出更好的贡献。

演革命戏，演现代戏，也是一个革命。在这个革命面前，我们要反对那种抱残守缺、迷信过去的保守态度；应该满怀信心地提倡现代剧，满腔热情地热爱现代剧。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现代剧一定会以革命的内容和革命的风格，在社会主义的舞台上，占居主要的地位，开放灿烂的花朵。

<sup>①</sup>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4—85页。



# 现代剧与艺术趣味

· 王朝闻 ·

在当前的艺术活动里，在对待反映革命内容的新戏剧上，出现了一种对立的现象：那些用无产阶级观点来认识现实，既集中地表现了当代观众的新要求，也适应了当代观众的新要求，既是很好的教育工具，也是很好的欣赏对象的现代剧，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为党所重视；和这同时，却也有一些人对于这些尽管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却只有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够产生，在质量上显示了飞跃进步的现代剧不感兴趣。

人们的艺术趣味不能也不应要求完全一致，革命者的艺术趣味在基本倾向一致的前提下，是会有个人差异的；但是当自己的艺术趣味和广大群众的艺术趣味对立时，却有必要找出，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是什么。

某一个戏的演出能不能引得起观众的兴趣，有作品本身的原因；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太差，当然引不起观众的兴趣。就观众的主观方面来说，如果他的审美标准、审美要求陈旧，那么，多么成熟的新戏也很难引起他的爱好。戏剧欣赏是一种复杂现象：由于个人具体条件的差异，同一阶级的观众对于同一戏剧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同一观众在

不同时期欣赏基本上稳定了的同一戏剧的演出，这一次和另一次的具体感受也很有出入。但是，不管这一切现象如何复杂，作为一定阶级成员的个人，艺术趣味的基本倾向，却总是要受他的审美标准和要求所支配，和他对实际生活的态度密切联系，归根到底是为他的世界观所决定。

投身于生活激流的革命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在热烈欢迎思想性、革命性较强的，反映了火热斗争的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不拒绝欣赏虽然娱乐性较强但内容健康的戏剧。而那些缺乏充沛的革命热情，对当前的革命斗争不感兴趣的人，却不愿接近思想性、革命性较强的艺术作品，对戏剧中那些尖锐的斗争生活不感兴趣，反而怪它单调，乏味。这样，他们就很难深入体验例如赵大大（《霓虹灯下的哨兵》）、李双双（《李双双》）、王连生（《汾水长流》）的内心感情，对他们的爱憎产生共鸣；同时，也不会深刻理解陈喜（《霓虹灯下的哨兵》）、喜旺（《李双双》）、林育生（《年青的一代》）以至姚母（《千万不要忘记》）的言行的社会意义。

新戏《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李双双》，《朝阳沟》，《年青的一代》，《汾水长





流》，《远方青年》，《千万不要忘记》等，由于它们具有强烈的革命内容，对观众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而为广大观众所欢迎。但是能不能说，这些新戏受到欢迎的原因，仅仅在于它们只有教育作用，而没有审美作用？仅仅在于它们揭示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尖锐矛盾，向观众提出和回答了青年人以至成年人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再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袭和反对它的腐蚀与溶化的斗争，可是缺乏艺术魅力？——不，不能这样说。尽管新戏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艺术形象的完整性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是，只要对艺术趣味这一概念不作狭隘的解释，不把宅和喜剧性以至噱头等同起来，那么，不能不承认广大观众热烈欢迎的这些新戏，它的战斗性和艺术性是密切结合着的，它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工具，同时也是很有艺术魅力，堪称有趣的欣赏对象。

这些新戏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特点和成就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基本上一致的：它们在革命观点指导之下，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发展着的现实，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物、新品质、新思想、新风尚；而且这种反映，就其主题、题材、形式、风格而论，也是多样化的，其严肃的政论性的思想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戏剧形式是统一着的；它既有较高的概括性而区别于生活本身，也有具体、多样的性格和冲突而区别于政论。譬

如在《千万不要忘记》里，戏开场不久就出现的关于工入干部家属应当不应当捡煤核的争执，就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着手，展开地揭示了不同观点的尖锐对立，获得了严肃的思想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李双双》里的两个主角之间的许多引入发笑也引入深思的冲突，更加显得戏剧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的和谐一致。因为它引导观众进入角色的灵魂深处，不仅打动观众的感官，而且打动观众的心灵，它对观众说来，既是有益的，又是有趣的。

如果有人还是认为这样的新戏没有趣味，责任不在新戏本身；新戏也决不会迁就他那旧的趣味标准和要求，而改变自己应有的革命的健康的倾向。

艺术的变革过程，这一种艺术的兴起、发展和另一种艺术的衰落，就某种意义来说，不能不受一定阶级一定时代的艺术趣味所支配；同时，集中体现了一定阶级一定时代的趣味的艺术作品，又不可避免地要反作用于艺术欣赏，广泛影响人们艺术趣味的变革。这是艺术与欣赏的辩证关系。戏剧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反映了群众的欣赏需要，也体现着这种关系。

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对立面的斗争：新趣味要代替旧趣味，旧趣味却在竭力保持和发挥它的影响。虽然任何违背先进阶级艺术趣味的趣味，都不可能阻止艺术不可避免的变革，但是，它在一定时期却



能起到妨碍新艺术发展的不良作用。为了适应革命事业的需要，社会主义的艺术不能迎合少数人落后的艺术趣味。

当然，艺术趣味、艺术爱好应该有它广大的空间，应该承认个人的、地方的差异；人们的艺术爱好应该广泛些、多样些。反对不健康的旧趣味，绝不意味着主张趣味的狭隘和单调。但是，趣味应该是广泛的，又应当是健康的，应当是与时代的风尚、革命的气氛、人民群众的喜爱相一致的。只要不是仅对于革命事业而且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有责任感的人，当他觉察到他自己和广大群众对新戏的态度相对立的时候，至少不会把艺术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割裂开来，甚至武断地认为群众不会欣赏艺术，自己才能够对它作出正确的审美判断；他也不会拜倒在形式上其实并不是十分完善，就其根本性的内容说来应当受到批判，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不相适应的，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戏剧之前，而夸大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戏剧的那些不难克服的缺点，抹煞它在思想上艺术上已经分明显示着的空前的成就；他不会以为只有旧戏才是真正有趣的欣赏对象，而对某些具有腐蚀作用的旧戏根本丧失警惕。

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看不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厌恶资产阶级趣味的赵大大，和陶醉在资产阶级香风里，嫌赵大大脸黑、古板、不灵活的陈喜，两人之间的冲突既是趣

味标准的冲突，也不只是趣味标准的冲突。在这种冲突里，揭示了两人已经大不相同的生活态度，表现了两人大有差别的思想感情。和坚持革命传统的赵大大不同，被资产阶级香风所薰醉了的陈喜，不仅改变了原有的趣味标准，也改变着原有对生活的态度。美与善的标准密切联系着，所以旧时代的评论者也承认：“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必然会堕落。”（狄德罗）而且这一戏剧表明：趣味不仅是生活态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它还会反过来影响是非善恶的标准。陈喜与春妮之间的冲突，不是很明显地表现了趣味与思想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吗？

艺术趣味也是人们的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可能独立于其他意识之外。人们的艺术趣味的基本倾向，归根到底是他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曲折的表现，是他对生活的态度的一种具体表现。广大群众对新戏剧所以有兴趣，是因为从那里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看到了自己的声音笑貌，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艺术趣味，也是和他们生活上的低级趣味相一致的。

人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需要改造，人们的非无产阶级的艺术趣味也得随着世界观的变化而起变化。但是，趣味与思想的关系表现得比较曲折，有些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在文艺欣赏上却有时候暴露出不利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旧



趣味。这种现象，一方面因为人们的艺术趣味和他的欣赏经验密切联系，因而它往往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习惯势力而作用于他的审美判断。另一方面也与思想改造的程度有关。艺术趣味的变革，涉及到人的意识的深处，涉及到人的情感领域的改造。这方面的改造是困难的，但它是可能的。新的趣味可以培养，一定要培养。正因为艺术趣味和其他意识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我们既不当简单地排斥各种可以欣赏的戏剧，也不应当忽视妨碍思想改造的非无产阶级的艺术趣味的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个人的爱好可以容许，但是必须和过去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旧的艺术趣味决裂，腐蚀战斗意志的旧趣味必须经过彻底的改造。不能认为沉醉于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歌颂对象的戏剧的人，其思想感情是得到了彻底改造的。

对于包括在社会主义教育和思想斗争中

起着很好的作用的新戏在内的新事物不感兴趣，不能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要是容许、姑息自己的旧趣味，对思想改造有极大的危险。作为旧思想情感表现的旧趣味，显然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着人们思想感情的彻底改造，这在艺术活动中往往表现为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在理智上认为应当欢迎的戏剧，却对它缺乏由衷的爱，明知不应当欢迎的戏剧，却又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它）。怎样克服这样的矛盾，不是很值得进一步考虑和力求解决的问题吗？

在《千万不要忘记》里，有几句台词读来很有启发。受了岳母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青年工人丁少纯打野鸭子卖钱的行为，他的父亲老工人丁海宽是这样论断的：“他要真是打野鸭子卖钱，这可不是小事呀，一个工人，通过邪门歪道去弄钱，那就是一种堕落！卖野鸭子，就算它是不违法的，卖来卖去也会把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卖掉！”在艺术活动里，如果不警惕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艺术趣味的侵袭，也可能像打野鸭子卖钱的丁少纯那样，不是促进革命热情更昂扬，而是促使革命意志趋于衰颓。



# 把美国侵略者从巴拿馬赶出去

沙 丁

## 震动寰宇的第一声春雷

近一个月来，长期遭受美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巴拿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伟大爱国斗争。这是一九六四年震动寰宇的第一声春雷，它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志，并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風暴将有更大的兴起。

一月九日，巴拿馬人民为了抗議美帝国主义践踏巴拿馬国家主权的专横行为，坚持在美国霸占的运河区升起自己的国旗，遭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镇压。美国侵略军用坦克、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巴拿馬人民疯狂射击，造成了死伤三百多人的大惨案。帝国主义的这一血腥暴行，激起了巴拿馬举国一致的愤怒和反抗，激起了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严正抗議。

在中、南美洲、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为了表达他们对巴拿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声援和支持，通过各种形式，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伸張正

义、反对侵略的示威运动。他们一致谴责美帝国主义蹂躏巴拿馬国家主权、血腥屠杀巴拿馬和平人民的罪行，坚决表示“要巴拿馬，不要美国佬！”“美国侵略者必须从巴拿馬滚出去！”哥斯达黎加“热带之声”电台强调指出：“在巴拿馬发生的罪行证明，如果人民力量不加以遏制，美帝国主义在采取镇压和野蛮行动方面是没有止境的。”烏拉圭左派解放阵线的成员组织——“东方革命运动”也发表声明说：“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应该保持警惕，加紧进行斗争，千方百计地一刻不停地反对美国殖民主义剥削，直到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全面彻底的解放为止。”

一月十二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热烈赞扬了巴拿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并宣布：“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毛泽东主席的谈话集中表达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支持巴拿馬人民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从十三日起，中国人民反美斗争的怒火燃遍了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和许多边远小城，参加反美示威运动的达一千六百万人以上。



在坚决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全球运动中，美帝国主义陷于空前狼狽和孤立的境地。他们惊呼：巴拿馬人民的反美斗争风暴使美国政府在推行侵略计划方面“遭到了一个新的挫折”，而且，在世界舆论战线上“遭到了惨败”。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报纸更是忧心忡忡地哀叹道：“拉丁美洲已经成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没有万灵药可以医治它的痼疾”；“现在，争取进步联盟——以美国政府名义作出的一大堆关于将有较好生活的冠冕堂皇的诺言——已经失败”。

### 运河区——美国侵略者的 扩张基地

为了摆脱自己“普遍受到批评”的困境，美帝国主义一面继续叫嚷巴拿馬运河区是“美国的土地”，美国“有公认的义务有效和安全地管理运河”，蛮横地对巴拿馬人民进行军事威胁；一面又花言巧语地施展骗术，说什么“美国力求遵循善邻政策”，希望“通过和平”来解决运河区问题，企图用谎言掩盖自己的罪责，欺骗世界人民。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声明中，不但无耻地说什么美国霸占巴拿馬运河是为了“国际商业的需要”，美国“同巴拿馬共和国的利益并不是不一致的”，而且反咬一口，诬蔑巴拿馬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暴民的袭击”，美国侵略军对巴拿馬人民的血腥屠杀是为了“抵抗侵略”。这真是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

十日所视，十手所指，美帝国主义对巴

拿馬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是绝对抵赖不了的。举世皆知，横贯巴拿馬地峡的巴拿馬运河区，从来就是巴拿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只是在美国侵略者的“大棒”政策的胁迫下，才沦为美帝国主义在国外的“国中之国”。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美帝国主义就已经积极策划，要在位于中美洲蜂腰地带的巴拿馬开凿一条贯通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运河，以使用它作为对外扩张、首先是向中南美洲扩张的基地。通过一连串的阴谋活动，美帝国主义终于排除了英、法两国，在一九〇三年夺得了独自开凿巴拿馬运河的权利，并把一项奴役性的美巴条约强加给巴拿馬人民。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美国在巴拿馬地峡取得了一条十六公里宽地区的永久占领、使用和控制权，以及其他一系列特权。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称：“运河必须绝对处于我们的军事控制之下。”

美帝国主义对巴拿馬运河区的霸占，绝不像约翰逊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什么“国际商业的需要”，而完全是一种最粗暴地侵犯巴拿馬领土、损害巴拿馬国家主权的强盗行为，完全是出于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和世界人民的需要。美帝国主义从它准备开凿巴拿馬运河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用它来为自己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的。

巴拿馬运河的通航，使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港口的航程缩短了万余公里。这对美帝国主义来说，首先在军事战略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通过这条“关键性的交通要



道和捷徑”，美国軍艦就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迅速調動，这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侵略和控制，便利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擴張，为美国同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在各地、首先是在拉丁美洲爭奪霸权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美国著名軍事評論員鮑德溫承认，美国侵朝战争时的許多供应品，都是从美国南海岸和东海岸的港口經過这条运河运去的；对南越战争的供应，很大部分也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去的；在“古巴危机”发生时，数以千計的美国海軍陆战队同样是从西海岸通过这条运河送到加勒比地区的。因此，他強調說，“在美国控制下的巴拿馬运河，作为美国的‘后勤生命綫’具有巨大的积极的战略价值”。美国陸軍部长万斯一月十四日向新聞記者发表談話时，也強調美国在巴拿馬运河区的軍事安排对美国政府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

美帝国主义还在“保卫运河”的幌子下，积极扩展它在巴拿馬的軍事基地，并在运河区訓練大批“反游击战部队”，用来进攻古巴和鎮压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一九六二年四月，美国派往危地馬拉鎮压当地人民爱国斗争的四百名“突击队员”，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去年六月，美国又宣布把設在运河区的“加勒比司令部”扩大为“美国南方司令部”，并建立了一支命名为“救火队”的特种部队，以便加强对拉丁美洲人民革命运动的軍事鎮压。目前，在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巴拿馬国土上，美国共駐扎了上万名美国軍

队，建立了三十六个軍事基地，并用各种名目開設了許多訓練反革命雇佣軍人的学校。巴拿馬已經成为美帝国主义在国外建立的准备用来鎮压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重要基地之一，而首先遭受到美帝国主义軍事鎮压的，則是和平的巴拿馬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

## 美国强盜的巧取豪夺

美帝国主义还利用巴拿馬运河对巴拿馬人民进行經濟侵略，巧取豪夺。据估計，美国西海岸海运交通的百分之四十都是通过这条运河；美国从拉丁美洲各国掠夺来的大量农产品和矿业原料，美国同远东的大部分貿易，以及从加拿大西部运往美国的木材的百分之七十，也都要通过这里，这就使美国壟断資本大大縮短了貨运時間和节省了貨运費用，加强了竞争能力。数十年来，美帝国主义还一直独吞着經營这条运河的絕大部分收益，到一九五九年止，美国仅从通行稅中得到的利益已达二十五亿美元之多。現在，美国仍然独吞着运河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每年从經營运河中得到的收益高达一亿美元，而它每年付給巴拿馬的所謂“租金”，經過几次修改，仅只一百九十三万多美元。

美帝国主义利用运河和运河区对巴拿馬人民进行着敲骨吸髓的殘酷剝削。它不仅壟断了运河区的铁路和港口，包攬了巴拿馬的国内貨运，从中获取巨額利潤，而且还利用运河区免稅的特权，大量傾銷剩余商品，禁



止巴拿馬的商品在运河区銷售，肆意摧殘巴拿馬民族經濟的发展。美国每年向巴拿馬輸出商品和劳务近一亿美元，而巴拿馬向美国的出口每年仅約一千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壟断的香蕉。美国还在巴拿馬開設了一百六十儿家大公司（截至一九六一年，美国在巴拿馬的私人直接投資为四亿六千八百万美元），搜刮巴拿馬的原料，剝削巴拿馬劳动人民。据統計，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期間，这些美国壟断公司就在巴拿馬攫取了三亿三千二百万美元的利潤。

巴拿馬人民的血汗养肥了美帝国主义，而巴拿馬人民自己却年复一年地过着极端貧困的生活。占人口百分之十以上的十二万巴拿馬工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受到种种欺压，經常有五分之一的工作者失业，就业者的工資不及从事最简单工作的美国人收入的十分之一。在运河和运河区的管理机构中，百分之九十的高薪职位也都是由美国人壟断的。这些以“太上皇”自居的美国人，在运河区过着驕奢淫逸的生活，作威作福，无恶不作。在巴拿馬农村，被称为“綠色魔鬼”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分公司，霸占着巴拿馬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八的橡胶种植园，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巴拿馬农民却缺少土地，生活极为悲慘。据《拉丁美洲經濟概况》一九六一年的調查，巴拿馬人民在貧病交迫的情况下，死亡率竟高达百分之九点八。

巴拿馬人民千辛万苦地用自己的双手开凿了巴拿馬运河。据历史記載，由于劳动条

件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他們当中有六、七万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个被称为“死亡的河岸”兩側的青山和黄土中，差不多每一公尺就留下了一具巴拿馬人的尸骨。但是，这条用巴拿馬人民的血汗和尸骨建成的运河，由于美帝国主义的霸占，却成为絞杀巴拿馬人民的绳索。美国侵略者通过巴拿馬运河和运河区，把巴拿馬人民的血汗抽干吸淨。正如巴拿馬一个社会活动家所說的：“这条航道本来应该成为通向光明的道路，可是現在却成了我国心臟的血淋淋的創伤。美国这样恬不知耻地支配着巴拿馬人民的财产和这样使用运河，不如把巴拿馬国徽上所題的高尚格言‘造福世界’换成‘造福美国佬’，这样说更确切一些。”

美帝国主义狂妄地把它对巴拿馬的殖民統治視为“永久性权利”，不仅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对巴拿馬实行种种控制，而且直接干預巴拿馬的内政，甚至不断通过政变推翻它不满意的政权。在这次巴拿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展开后，美帝国主义的喉舌美联社又在公开鼓动用軍事政变推翻現任政府，这家通訊社在报道美国陆軍把“小股军队調至运河边界”时，別有用心地說：“許多巴拿馬人担心三千人的国民警卫队（巴拿馬的陆軍）嘗試推翻恰里（总统）和抑制反美运动”。这不能不引起巴拿馬人民的警惕。

美帝国主义在巴拿馬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这个一貫以“自由”“平等”自我标榜的强盜头子，完全是以最殘酷的殖民手段来对待它的“邻邦”的。这一点，就速英、法等老



牌殖民主义者也难以隐讳，他们趁机攻击说，美国正在巴拿马“作为可恶的殖民主义者倒行逆施”。甚至美国的参议员也不得不被迫承认：“我们就像老式殖民者一样”，“我们正在得到报应”。

##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残暴的殖民统治，哪里就有爱国的正义斗争。从美帝国主义霸占巴拿马运河区的那一天起，巴拿马人民就一直在为收回运河区的主权、废除美巴不平等条约和赶走美国占领者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巴拿马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第一次修改了美巴条约，并规定美国利用运河区以外的土地必须取得巴拿马政府的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四七年，巴拿马人民掀起了一系列反对美国在巴拿马强占军事基地的强大示威运动，巴拿马国民议会因此否决了美国续租基地的协定，从而迫使美国陆续撤出战时强租的一部分基地。一九五六年七月，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巴拿马人民的斗争，首都和各地人民举行了强大的反美示威游行。一九五七年，巴拿马大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收回运河。接着，巴拿马大学生联合会也发表声明，强调收回运河是巴拿马人民不可改变的目标。一九五八年五月，巴拿马首都学生和市民又掀起了历时五个多

月的要求收回运河区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美国佬”的口号，并在运河区升起了五十幅巴拿马国旗。在这次斗争中，有十八名学生惨遭杀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巴拿马人民又先后发动了两次强大的要求收回运河区的反美爱国斗争，运河区的美国警察竟开枪射击示威群众，使一百多人受伤。这一暴行激起了巴拿马人民更大的愤怒，示威的群众袭击了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和一些美国企业。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期间，巴拿马人民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续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进入一九六四年，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次斗争的规模之大，参加的阶层之广，群众斗争情绪之高昂，都是巴拿马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在美国军队开枪屠杀巴拿马人民的暴行发生后，声势浩大的反美爱国斗争立即席卷了巴拿马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激愤的爱国群众振臂高呼“美国佬滚回去”、“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没有主权毋宁死”等口号，他们不顾美国军队的血腥镇压，袭击了美国大使馆，火焚了美国新闻处的办公室。十二日在巴拿马城为被杀害的爱国人民举行葬礼时，有十万人，即全国人口百分之十的人参加，这是巴拿马人民又一次抗议美国侵略、维护主权和国家尊严的大示威。巴拿马政府在全国人民强大的反美爱国斗争的推动和支持下，已经宣布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要求签订新的运河条约，并彻底审查美巴关系；国内十六个政党也一致声





明支持政府的这一决定。

## 胜利属于敢于斗争的人民

英勇的巴拿马人民从六十多年的长期斗争中，愈来愈觉醒，愈来愈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美帝国主义是巴拿马人民最好的反面教员。特别是这一次美帝国主义屠杀巴拿马人民的罪行，更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穷凶极恶的侵略本性，彻底揭穿了它的和平伪装。就在美国军队对巴拿马人民挥舞屠刀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约翰逊还扬言什么美国必须成为拉丁美洲国家“更好的邻邦”，但是事实证明，约翰逊的这种动听的言词，只不过是他用来欺世盗名的谎言，它丝毫也掩盖不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现在，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是巴拿马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的英勇斗争，给予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它再一次证明了：正义的斗争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巴拿马虽然是一个长期遭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小国，但是，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既没有在美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屈服，也没有为敌人的小恩小惠所诱骗而落入圈套。他们对敌人不

抱幻想，始终坚持斗争。这种不畏强暴、不为利诱的斗争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还有力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尽管它用核武器把自己全身披挂起来，张牙舞爪地在全世界充当国际宪兵的角色，但是，它永远也阻挡不了全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

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得到了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持。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他们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完全能够而且必须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互相鼓舞，互相支持。

目前，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尽管巴拿马人民今后的斗争还会经历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过程，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整个国际形势对巴拿马人民的斗争是空前有利的。我们深信，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团结一致的巴拿马人民，通过自己的英勇斗争，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洗刷掉六十年来的屈辱，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巴拿马运河区。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勇的巴拿马人民！



# 战后美帝国主义与其他

## 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货币斗争

項 冲

帝国主义在对外扩张中，通常是把货币作为扼杀竞争对手、扩大剥削范围的有力武器。因此，在它们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通常是包含着争夺金融霸权的斗争。

早在一九一六年以前，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就曾注意到英国和平主义者布莱斯佛德的这一说法：“金融和外交互相效劳，在现代世界里，它们是相互需要的。……如果某一个大国或者大国集团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能保持哪怕是只有几年的垄断地位，并且能有意識地加以利用，以达到政治的目的，那它终于会使俄国、中国、土耳其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听从自己的意志。”<sup>①</sup>

一九一七年，列宁又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力量，“取决于银行的多少”。列宁还引用一家美国亿万富翁的报纸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在欧洲，现在进行着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要想称霸世界需要两件东西：美元和银行。美元我们是有的，我们要建立银行，我们将要称霸世界。”列宁认为，“美国这个高傲自大恬不知耻的亿万富翁

说出来的这句厚颜无耻的话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资产阶级撒谎家的千百篇文章所包含的真理超过一千倍<sup>②</sup>。

为了夺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霸权，帝国主义总是要以它的经济、政治实力作为后盾，千方百计地使本国的货币居于领导地位，而把其他国家的货币作为自己的附属物。对帝国主义来说，如果其他国家的货币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与本国货币建立固定的联系，并把黄金外汇集中存放在本国，作为其他国家在市场上按照这一固定比例进行公开买卖的储备基金，那么，它就能够在其势力范围内形成一个金融中心和确立它的金融霸权。当然，这个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如何有利于本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出生，以及国外原料输入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也必须把有利于自己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这样进行商品和资本的输出生才不会因外国货币贬值而受到损失，搜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32页。

<sup>②</sup>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73页。



刮原料也不会因本国货币贬值而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代价。同时，外国的黄金外汇储备集中存放本国以后，又便于本国垄断资本利用所谓“国际银行家”的地位，作为对外扩张、对内剥削的资本周转之用。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国际金融领域内的货币斗争，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销售市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的一个重要手段，成为它们之间不断重新分割世界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特别是资本主义货币制度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货币斗争。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各国之间正常的金融关系遭到空前的破坏，金本位制彻底崩溃，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制度从根本上丧失了稳定性。从此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为了维持国内货币的稳定，挽救货币制度的危机，以便在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中巩固自己的阵地，便不能不借助国家的力量，在其对外金融领域内，采取停止支付外债、宣布货币贬值、实行外汇限制等干预性的措施。但是，这一切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作法，不但没有能够使它们摆脱自己的困境，反而使它们之间的斗争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地盘和剥削范围。狭路相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它们更加广泛地利用货币作为相互厮杀的工具。它们不仅像过去那样把殖民地、附属国的货币作为本国

货币的附属物，而且还在日趋狭小的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竭力争夺本国货币的领导权。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货币制度的危机，也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而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金融领域内，进一步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干预性措施，但是，不论是由较强大的一方强加于较弱小的一方，还是由较弱小的一方利用这些措施来摆脱对手的压榨和扼杀，其结果都必然使它们之间的货币斗争比战前进一步加剧。

## 二

战后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一方，力图巩固和扩大它的霸权地位；以其他帝国主义为另一方，则始终不甘心于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并且力求摆脱这种控制。这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领域内，也有强烈的反映。

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发了横财，大大扩大了生产能力和出口贸易。战后初期，它利用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一度退出资本主义世界竞争舞台，以及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机会，拼命向外进行经济扩张，从而出现了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积累了大量的黄金储备。一九三八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只有一百四十五亿九千二百万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比重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一，到一九四八年，便上升到二百四十三亿九千九百万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分之七十点三。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此期间却对美国出现了巨额支付赤字，形成当时所谓的严重的



“美元荒”和黄金大量流向美国的局面。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十年間，英国和英镑区国家以及西欧大陆国家的黄金储备，从九十五亿一千一百万美元下降到五十七亿零七百万美元，所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比重，从百分之三十六点六下降到百分之十六点四。当时，在美国以外的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国内生产破坏，预算赤字激增，再加上国际收支逆差的影响，普遍发生严重的货币贬值现象。它们的政府面临这种形势，便不能不加紧推行外汇限制等措施，企图通过人为的力量求得国际收支的平衡和币值的稳定。结果它们的货币就降为不能“自由兑换”为外国货币的“软币”，而无法与可以“自由兑换”的“硬币”——美元那样相比拟。

这种经济实力的变化，大大有利于热衷于争夺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它力图在资本主义世界内建立一个庞大的美元集团，作为它在全世界建立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的配合手段。而要实现这样一个狂妄的计划，美国垄断资本除要采取政治、军事和经济其他方面的措施外，在金融领域内还必须：一方面，巩固美元的对外价值，维持美元的“自由兑换”，以便于其他国家货币的对外价值与美元维持在一个固定比价上，并且使美元与黄金同样可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储备，从而为美国向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扩张，以及使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在国内及其所控制的货币集团内进一步采取外汇限制等措施，来防止对方经济势力的渗入，美帝国主义又必须

拼命干预它们的对外金融政策和外汇限制制度，以便同它们维持正常的贸易关系，防止第一次大战后“连最富有的、控制所有国家的美国也无法做买卖”的史实重演。

美帝国主义的这一狂妄计划，实质上不过是过去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内，建立自己的货币集团的翻版。但是，为了避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扩大推行这一计划时，不能不采取更为隐蔽、更为狡猾的手法。

首先，美帝国主义挟持其雄厚的黄金储备，把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政府或中央银行进行买卖的黄金价格（指不兑现纸币流通条件下，用货币来购买黄金的“价格”），压到“垄断低价”的水平。所谓“低价”，是指美元对黄金的比价（即对外价值）始终维持在一九三四年所规定的每一盎司纯金折合三十五美元这个“官价”上，而美元的对内价值，也就是美元实际代表的含金量，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到了一九四八年只有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八（一九六三年更下跌至百分之四十四）。这样，美元的对外价值就被人为地抬高，而黄金价格则被人为地压低，形成美元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长期背离的现象。

当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美元荒”，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有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因此，这种压低黄金价格的作法，实际上是迫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按“低价”向美国变售黄金，以抵补巨额美元赤字。这样，美帝国主义就可以在获得巨额国际收支顺差的同时，趁机向其战时的同盟国按“低价”搜刮黄金，并使它们的“美元荒”由



于金价偏低而难以减轻，最后不得不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奴役性的“马歇尔计划”或其他各种“援助”，从而进一步受美帝国主义的控制。

美帝国主义的黄金“低价”政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通过政府干预的方法，人为地稳定美元的对外价值，使对内不断贬值的美元，在一定的对外范围内可以按固定比价折换成黄金。当时，美帝国主义曾狂妄地以美元与黄金同样成为世界货币自居；而其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本身币值的不稳定，对外汇率很多与美元相联系，也都把美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内除了英镑以外的唯一重要的储备货币。这样，就使美帝国主义控制了其他国家的货币，在国际金融领域内成为一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其次，为了使美国的商品输出和投资利润的汇回不受各国外汇限制等的束缚，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还打着“汇兑自由化”和“稳定汇价”、“避免货币对外贬值的竞争”等幌子，压迫其他国家取消外汇限制制度，并且把它们的货币的对外汇价在有利于美国的比例上相对稳定下来。

虽然美帝国主义在表面上并没有公开把它的“盟国”的货币强置于自己的控制下，但是在实际上，却力图通过各种威胁利诱的措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迫使其他国家所接受的各种“援助”，都附有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外汇限制等条件。一九四五年英国接受美国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大借款，曾在一九四七年被迫实行五个星期的英镑“自由兑换”（最后因为在“自由兑换”期内黄金和美

元损失过多，而不得不全面恢复限制），便是一个显著的实例。而更重要的是，战后初期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名义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向各会员国提供短期贷款为诱饵，迫使它们接受消除外汇限制、货币对外汇价应以一定黄金成色和重量的美元表示，以及一定幅度上的汇率变动必须取得“基金”同意等等丧失国家主权的条款。

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措施，当然要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可是在当时，西德和日本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西德马克和日元的币制改革都是根据美国政府的方案实行的。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国内发生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国际收支急剧恶化，法郎和里拉曾经多次贬值，也很难与美元的势力相抗衡。因此，对美元具有一定还击力量的，只有英国的英镑。尽管英国的力量在战后已进一步趋于衰落，可是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它还有广大的英镑区作为后盾，英镑还是英镑区国家以及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储备货币，在上一个世纪把“全世界网罗了起来”的英国海外银行网，也还有很大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货币斗争，自然以美元和英镑之间的斗争最为突出。

英国在英镑区范围内全面实行的外汇限制制度，是加强英帝国主义对英联邦国家的剥削和防止美国经济力量渗透的一个有力支柱，而对美帝国主义来说，它却是向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扩张的一个严重障碍。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通过贷款、“援助”和各种国际组织的压力，千方百计地想迫使英国开放英镑区和恢复英镑对外“自由兑换”，以便为控



制整个英镑区国家和英国本土开辟道路。英帝国主义对此虽然一直采取阳奉阴违、有意拖延的手法，但一九四九年英镑对美元贬值百分之三十点五，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三十五个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大贬值，在很大程度上未始不是屈服于美帝国主义施加压力的结果。

可是另一方面，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美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也总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不时给予反击。例如，英国的英镑区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建立的货币集团，如法郎区等，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始终没有轻易放手。又如在黄金价格问题上，英国、比利时和英镑区的若干国家，由于拥有大量黄金产量（英镑区国家黄金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也曾为提高金价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控制斗争，最后迫使美国作出让步，允许它们用另一种形式在自由市场上按高价出售黄金。至于在取消外汇限制以及与美元规定固定比价等问题上，许多国家更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于不顾，如法国和意大利，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还未规定它的固定汇价。由此可见，尽管美帝国主义不留情地想把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置于美元的控制之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是不甘心于被控制的地位，而力求摆脱美元的魔掌。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随着它们之间“资本”和“实力”对比的变化，日益趋于尖锐化。

### 三

进入五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更加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

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西德、意大利、日本三个战败国，在美国扶植下已经复活起来；法国的力量不断有所发展，逐步与美国分庭抗礼；英国虽然日趋削弱，但也不甘受美国摆布。这就使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所建立起来的优势，开始发生动摇。

这种不利于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金融领域内。一九五〇年侵朝战争发生后，美国的国际收支开始发生逆差，黄金开始外流。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美国经济危机时期，也出现了同样情况。一九五六年以后，美国趁英法侵略埃及的机会，大量向西欧倾销石油及棉花等，这虽使美国的国际收支一度发生好转，但是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七年中，美国的黄金流出共有十七亿美元之多，加上对外短期债务的增加额，每年逆差年率平均达十二亿美元左右。同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储备增加三十七亿美元，美元储备增加六十四亿美元。战后初期普遍出现的“美元荒”，到五十年代基本上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

一九五八年以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所进行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由于美帝国主义不断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结果使以国际收支逆差和黄金外流为表现形式的美元危机愈来愈严重。这种美元危机与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同时爆发或交替爆发，使美帝国主义用尽各种方法也挽回不了美元一天天烂下去的局面。另一方面，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其中特别是以法国——西德为轴心的共同市场六国，则随着政治、



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国际收支情况大大改善，黄金大量流入，它们的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五年内，美国的黄金流出共达六十八亿美元，加上对外短期债务的增加额，国际收支平均逆差年率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十二亿美元左右猛增至三十亿美元以上。与此同时，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储备增加了八十七亿美元。如果以黄金、外汇储备合并计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该期内共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亿美元，而且大部分集中在西欧各国，其中法国增加三十四亿美元，意大利增加二十二亿美元，西德增加十七亿美元，英国、荷兰、比利时各次之。

到了一九六三年，美元危机这个不治之症，陷入比前几年更加严重的地步，美国该年上半年国际收支逆差年率达四十二亿美元，超过一九六〇年逆差最高峰三十九亿美元的数字。截至六月底止，美国的黄金外汇储备计一百七十亿六千四百万美元，其中黄金储备为一百五十八亿二千九百万美元，只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比重的百分之三十八；相反地，西欧各国的黄金外汇储备为三百零六亿六千一百万美元，其中黄金储备为一百九十亿一千二百万美元，已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比重的百分之四十五。从黄金储备的比重来看，美国已远远低于战前的水平，而西欧各国已远远超过战前的水平。

在力量对比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利用美元作为武器控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货币的种种手法，现在已被竞争的对手反过来用作反控制斗争的

王牌了。从下列各点，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一种趋向：

第一，美国政府虽然仍在勉强维持战后初期所推行的黄金“低价”政策，但是这个垄断“低价”目前不仅不能达到对其他国家巧取豪夺的目的，相反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却可以利用它作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有力武器。

由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已转为顺差，除了从美国流入大量黄金外，还有了由于美国短期债务的增加而形成的美元储备，于是，战后初期的“美元荒”，到目前已变为“美元过剩”。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反控制斗争过程中，利用多余的美元存款随时按“低价”向美国政府挤兑黄金，迫使美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了。一九六二年，戴高乐政府在美国黄金外流的时候，向美国挤兑一亿多美元的黄金，给美帝国主义以很大的压力，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从美帝国主义方面来说，现阶段竭力维持“低价”政策，实际上不过是为了避免摇摇欲坠的美元对外公开贬值，从而可能导致“美元作为国际通货的结束以及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美国退出目前世界性作用的开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国联邦准备局理事会主席马丁在匹兹堡的演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一九六三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演说中，就曾大声疾呼，在“保卫美元”的时候，“谁都不应把谨慎和怯懦、缺少决心和周密行动混为一谈”。这个美国垄断集团利益的维护者表示，“决心用尽一



切方法保卫美元在目前固定的汇价上自由兑换”，也就是“把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例保持在当前三十五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的价格上”。但是，在国际收支发生经常性逆差和黄金不断外流的条件下，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像战后初期那样，可以借助于这种“低价”向其他国家搜刮更多的黄金了，它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乃是如何设法避免外国政府随时用它们所掌握的大量美元存款来挤兑黄金的问题。为此，美国政府近几年来不得不暗中要求西欧各国中央银行“谅解”，同意在必要时停止以美元存款向美国兑取黄金。一九六二年，美国政府更进一步请求西欧各国与美国拼凑资金成立“黄金总库”，以便联合力量使伦敦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稳定在每一盎司三十五美元左右。最近约翰逊在国情咨文里，也向他的“盟国”发出呼吁，要求它们在“保持目前美元的黄金价值”方面同美国“合作”。固然，在一定条件下，为了防止美元对外贬值而可能引起资本主义货币制度的进一步动摇和国际金融关系的进一步混乱，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会给美元以各种形式的暂时支持，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暂时的共同利益而互相勾结，是不可能根本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而且，就在勾结的过程中，必然孕育着更尖锐的、更大范围的斗争。

第二，由于美元危机正在不断加深，美元公开对外贬值的传说始终无法平息，一度以世界货币自居的美元，在各国货币对它维持固定的比价以及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方面，都已经愈来愈对它不利。

早在一九六〇年以前，西欧有些国家已经酝酿着使本国货币与黄金相联系而不与风

雨飘摇的美元维持固定的比价。其后，这些国家更要求把积存的美元存款（即美国政府的对外短期债务）附有黄金保值条款，这就是说，要求存放在美国的美元存款，应以目前的美元法定含金量作为担保，使美元在对外公开贬值（即黄金“价格”的提高）的时候，积存款项不致受到损失。一九六二年英国财政大臣莫德林提出的世界货币制度“改革”方案，更建议逆差国家对顺差国家的短期债务，应由一个国际机构以一定的含金量作为保证。莫德林所谓的逆差国家，主要是指美国而言。所有这些要求和建议，实质上都是其他国家对美元的公开不信任，这对美帝国主义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可是，这与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要求各国稳定币值并把它们的对外汇率依附于美元的情况相对比，已成为对美元的莫大讽刺。同时，这也是对美国统治集团要求“保卫美元”的呼吁的重大打击。

到目前为止，美元和英镑确实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最重要的两个储备货币，而且美元作为储备的范围还远比英镑广泛（在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和英镑区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约一百六十亿美元，其中以美元存款形式存储的即达一百三十亿美元）。但是，在美国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极不稳定的条件下，这种以美元存款形式存放在美国的各国外汇储备，一有风吹草动，随时有被兑换为其他国家的货币或者申请兑换为黄金的可能，这对于黄金储备日益不足的美国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而且，随着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与年俱增，外国政府所积存的美元储备必然愈益





增多，美国本国的黄金储备必然愈益减少，对外短期债务必然愈益上升，从而使美元在国际上的信用更加动摇。在很大程度上，这又使美国本国的短期资金大量向外国逃避（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美国国内短期资金流出年率平均每年达十六亿美元之巨），结果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将更加扩大，形成美国对外金融领域内的一个不可克服的“恶性循环”。为此，美国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御用学者，纷纷建议扩大美国操纵下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职能，让美国的“盟国”在国际金融“合作”的幌子下，多分担一些资金和义务。由此可见，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在美帝国主义不断趋于削弱的情况下，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第三，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企图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所谓货币“自由兑换”，到了一九五八年以后，西欧各国纷纷实行；但是它已不再是美国原先期望的那样，作为美国控制其“盟国”货币的手段，相反地，它已成为对美元统治地位的“重大的挑战”。

一九五八年西欧各国货币的“自由兑换”，是在它们的经济力量逐步恢复和走向独立发展的基础上实行的，而不是美帝国主义施加压力的结果。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当它们的经济力量已经开始上升的时候，它们的一部分垄断集团就酝酿着货币的“自由兑换”，以便趁机提高自己货币的威信和争夺世界金融霸权。一九五四年英国、西德两国逐步放松外汇限制和恢复伦敦黄金自由市场，便是它们与美元争霸的先声。到了一九五八年，当它们恢复“自由兑换”的条件已经大致成熟，同时西欧共同市场的形成也必然

要导致六国内部首先实行“自由兑换”，所以在该年年底的短短几天内，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等许多西欧国家，差不多同时实行了全部的或有条件的“自由兑换”。

当然，这种“自由兑换”和金本位制度下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为黄金以保证货币对内价值的相对稳定，具有原则性的不同。战后，每当资本主义国家国际收支恶化、外汇行市极不稳定的时候，它们就不得不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来限制外汇的自由买卖；一旦它们的经济实力有所恢复，则又设法取消外汇限制，并在政府维持固定汇率的基础上恢复不同程度的“自由兑换”，借以加强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和竞争能力。从限制兑换到“自由兑换”，是当前垄断资本通过国家的力量捍卫本身的利益和对外实行经济扩张而采取的相互交替的形式。一九五八年西欧各国的“自由兑换”的浪潮，正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力量对比有利于它们的条件下，相互间争夺金融霸权以及与美元争夺货币领导权的表现。如果说，在金本位制度下的自由兑换，在客观上还起了一些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话，那么，帝国主义国家在现阶段所实行的“自由兑换”，正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下，重新瓜分世界市场以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向其弱小的伙伴进行经济渗透的新形式。

由于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已经可以“自由兑换”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美元已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上最主要的“硬币”，英镑、西德马克、法国法郎等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已逐步与美元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近二三年来，每当美元危机爆发的



时候，国际金融市場上往往形成抛售美元购入其他国家货币的浪潮，从而使美元对外价值发生动摇。美国政府面临这种窘境，近年来不得不向西欧各国、加拿大和国际清算銀行訂立許多双边备用貸款协定（双方都按本国货币出借），在西欧金融市場上发行外币国庫債券，向国际货币基金組織借入外币的备用貸款，以便在必要时抛售借入的外币购入美元，来減輕国际金融市場上抛售美元或以美元搶购黄金的压力。最近美国政府为了限制美国私人資本不断外流，还准备对美国居民购买外国在美国发行的有价证券增加稅收。在实质上，这是一种变相的外汇限制措施。凡此种种，可見一向以“汇兌自由化”为幌子来压制其他国家取消外汇限制的美帝国主义，到了今天，却反过来在西欧各国“自由兌換”的货币面前屈辱让步，連自己也不得不考虑采用外汇限制的办法来“保卫”美元了。这一切都說明，战后初期的美元优势已經喪失，美帝国主义以美元称霸于世界的幻想已經破碎。

虽然，到目前为止，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建立的由它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組織中，还拥有最多的份額，还能操纵“基金”的表决权，但是这种情况也已发生了某些变化。近几年来，由于美元和英镑交替爆发危机，“基金”的资金既不足以对付发生危机的国家大量周轉的需要，又不足以适应資本主义世界貿易增长的需要，因此，在美国的倡議下，“基金”要求各會員国继一九五八年以后再次增資。当时西欧六国虽勉强同意，但坚持新摊派的資金不应再由“基金”集中掌握，而应另行成立一个“巴黎俱乐部”（即十国多

边貸款协定），提供备用貸款六十亿美元作为“基金”的后备力量。然而这个“协定”的表决权，根据該协定的規定，实际上已落入共同市場六国之手，使美国在国际金融組織中喪失了部分的領導权。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打算在資本主义世界建立一个龐大的美元集团，从而有利于建立一个空前的大帝国的計劃，曾几何时，已經走到了它的反面而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了。

#### 四

尽管目前美元的地位已經大大相对削弱，但是，美帝国主义迄今仍是現代最大的国际剝削者和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美元还是資本主义世界最有力量的货币。美国除了拥有資本主义世界百分之三十八的黄金儲备外，还有包括加拿大、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等国的“美元区”作为实力后盾，日元等货币也仍然以美元作为基本儲备而屈从于美元的势力，資本主义世界最大商业銀行的前几名也都屬美国所有。因此，以美元为一方、以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为另一方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目前不是削弱而是加深了。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随着当前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重新分化和組合，出現了一些新的动向。

当前資本主义货币斗争中的一个动向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間以货币集团形式展开的斗争，将随着国家壟断資本在国际范围内的暫時联合而进一步加剧。

早在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机发生以后，資本主义世界已分裂为美元、英镑、法郎等



許多货币集团。战后，在民族解放运动洪流的冲击下，比利时法郎区和荷盾区已经趋于瓦解，英镑区与法郎区的内部联系也大大削弱。但是，到目前为止，英镑区国家的黄金外汇，还有很大部分集中于伦敦，这种储备折换成为英镑存款以后，仍然不能自由兑换为美元。法郎区内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及其外汇储备，也仍然与法国法郎维持联系。英法两国对于货币区内的贸易，目前还各占它们的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和百分之二十左右，形成与美元区相抗衡的一股势力。

在帝国主义的剥削范围日益狭小的情况下，货币集团成员国的构成，也从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逐步转向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之间。自从西欧六国共同市场成立以后，六国在共同市场范围内放松贸易壁垒的同时，必然要求在金融领域内逐步采取“统一”的措施。到现在为止，六国已经成立了共同对外经济扩张的金融机构，内部的投资、信贷和证券交易，也已实行了不同程度的“自由流动”，并且还酝酿着成立六国的共同外汇储备，“协调”六国之间的对外金融政策以及限制外国资本，其中特别是美国资本在共同市场内部渗透，以便为成立六国货币联盟甚至“统一”六国的货币创造条件。当然，目前共同市场各国之间的矛盾百出，步调不一，同时又遭受到新的通货膨胀浪潮的压力，所谓“统一”的货币制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它们之间联合起来反击美元势力的渗入和争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权，对美帝国主义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除

此以外，六国货币也有共同打击英镑及英镑区的一面。英国对外短期债务本来已远远超过它的黄金外汇储备，现在被排斥在共同市场以外，更不是六国的对手。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在国际金融领域内的反映。

现阶段帝国主义货币斗争的另一个动向是：美元和英镑暂时相互勾结以与共同市场六国货币相对垒。

毫无疑问，从战后初期到现在，美元和英镑之间，围绕着黄金价格和英镑区问题两个方面，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近，由于两国政府竞相提高国内利率，以便多方吸引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彼此在利率政策上更不可能协调一致。自从英国要加入共同市场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打算宣布英镑对外贬值以便刺激出口之说，曾经甚嚣尘上。如果在一定条件下英国政府当真这样做的话，那么由英镑贬值所可能引起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竞相对外贬值，将使美帝国主义在争夺销售市场方面再次受到重大打击。这和一九四九年美国压迫英国实行英镑对外贬值，借以对英镑区进行掠夺的情况相比，景况已完全不同。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由于美元和英镑同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两个基本储备货币，一方的加强固然可以削弱另一方，一方发生危机也可以影响另一方。近年来，这两个主要储备货币交替发生危机，而西德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瑞士法郎等行市始终坚挺。为了相互支持而不致于同归于尽，美英帝国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联合起来和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一九六一年在维



也納举行的国际金融會議上，为了爭奪对国际货币基金組織的控制权，就以美英为一方，西欧六国为另一方，形成了相互对壘的局面。英国打入共同市場的企图失败以后，美英双方又相互開設了价值五亿美元的双边貸款协定，以便其中一方发生危机时，由另一方用本国貨幣給以支持。最近，作为美国壟断資本喉舌的布魯金斯研究所，曾提出一份关于美国国际收支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建議，美元与英鎊联合成立一个更大范围的貨幣集团，使美元与英鎊之間維持固定汇率，美英两国的資本市場融而为一，英鎊区国家存放在英国的英鎊存款，可以对美元“自由兌換”。这个建議固然有挖英鎊区牆脚的一面，但美国企图联合英鎊来压制六国貨幣“联盟”的抬头，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六国來說，它們始終认为美英两国国内的通貨膨脹，是美元和英鎊不断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它們表示沒有长期支持美元和英鎊的义务，也沒有必要把自己貨幣的对外汇价长期与价值不稳定的美元相联系。过去法国、荷兰、西德的財政金融当局，曾迭次对美国政府所实行的赤字預算政策加以“訓誡”。在美国要求大家出錢“保卫美元”时，法国财政部长曾強調，这只有—定的限度，因为这些貨幣儲备是法国人劳动的果实，必須注意合理使用。目前，六国的壟断資本，其中尤其是法国壟断資本，总是力图設法在已經形成的西欧共同市場范围内，最終成立一个以法国法郎和西德馬克为中心的“区域性”的“西欧貨幣集团”，来摆脱美元的控制和美元与英鎊的影响。总起来說，尽管美元与英鎊之間还会随着美英帝国主义之間矛

盾的加剧而不断发生新的斗争，美元与西德馬克之間也会随着国际形势的風云变幻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勾結，但是目前在帝国主义陣营內，貨幣金融領域朝这个方向的重新組合已經初步形成。

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間貨幣斗争空前尖銳的局势下，各国壟断資本家和他們的御用学者，为了挽救貨幣制度的危机，曾提出形形色色“改革”世界貨幣制度的方案。过去在每年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組織年会中，都曾圍繞着“改革”方案发生过激烈的斗争。这些壟断資本家和御用学者們，把过去帝国主义国家之間为了避免世界貨幣制度瀕于崩溃的暂时相互支持，美化为“国际金融合作”，并且还企图在这个幌子下，提出关于黄金价格、外汇儲备、外汇汇率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但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不会改变，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相互爭奪、相互厮杀不可調和，因而它們之間也就根本談不上什么真正的合作。

由上可見，战后帝国主义各国之間貨幣斗争的日益尖銳化，是它們之間不断重新分割世界的反映，是資本主义总危机和資本主义貨幣制度危机进一步加深的結果。与此同时，貨幣斗争的尖銳化又反过来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間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目前，貨幣斗争的形式，已經从外汇限制轉換到“自由兌換”，从国与国之間轉換到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間，因而一个国家的貨幣危机将比以前更加易于影响到其他国家，更加容易震撼整个資本主义世界貨幣制度和其他經濟領域。完全可以預料，这方面的斗争，今后将随着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的加深和資本主义貨幣制度危机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